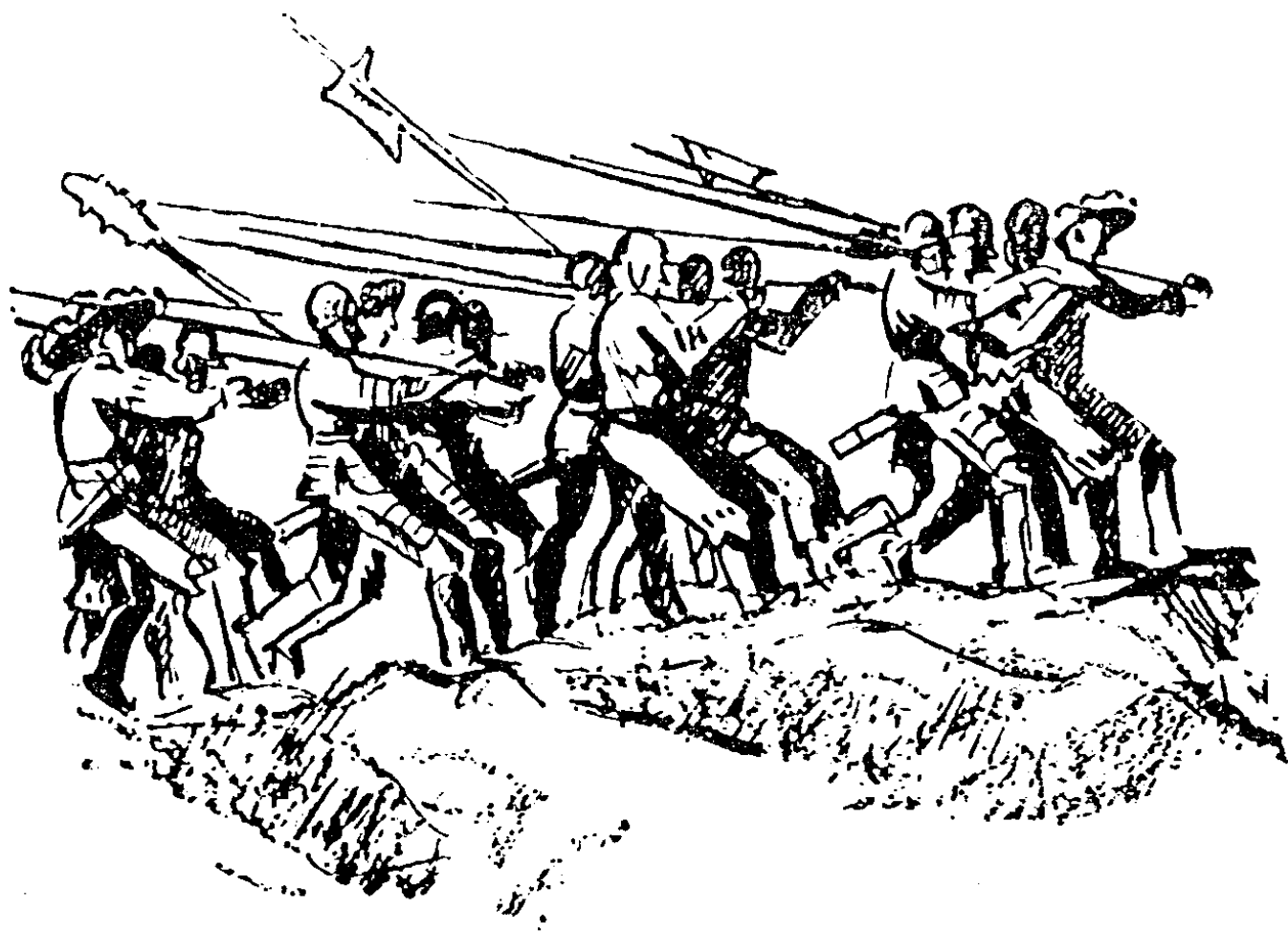


一個美 國人的 塞上 行



一個美國人塞上的行

史諾原著

俠名譯

發行

新 生 出 版 社

1938.3.20.初版

目 錄

| | | |
|---|-----------------|----|
| 一 | 神祕的中國在哪里····· | 一 |
| 二 | 紅色中國是什麼····· | 二 |
| 三 | 只有親身走一趟····· | 七 |
| 四 | 故都以外的人類脈膊····· | 八 |
| 五 | 最近的目的地——西安····· | 一〇 |
| 六 | 楊虎城與邵力子的訪問····· | 一三 |
| 七 | 向西安北部而西····· | 一六 |

| | |
|--------------------|-----|
| 八 赤都延安····· | 110 |
| 九 衝進了紅色的門戶····· | 111 |
| 一〇 紅區第一夜····· | 116 |
| 一一 白色土匪····· | 118 |
| 一二 第一個紅色戰士····· | 121 |
| 一三 從安塞到白家坪····· | 123 |
| 一四 小紅鬼····· | 125 |
| 一五 到司令部去····· | 128 |
| 一六 叛逆的學者——周恩來····· | 132 |
| 一七 幽默的戰士····· | 137 |

| | | |
|----|------------------|----|
| 一八 | 老狗·老表·鐵老虎等等····· | 三三 |
| 一九 | 紅軍大學及其校長林彪····· | 六〇 |
| 二〇 | 紅軍大學的學生活動····· | 六三 |
| 二一 | 解放戰爭中的戰績····· | 六六 |
| 二二 | 走向抗日劇社去····· | 七一 |
| 二三 | 老農一席談····· | 八〇 |
| 二四 | 黃埔學生劉子丹····· | 八七 |
| 二五 | 災荒與貧困····· | 九〇 |
| 二六 | 政治影響····· | 九五 |
| 二七 | 文化和經濟····· | 九六 |

| | | |
|----|----------------|-----|
| 二八 | 僅有的城市····· | 二七 |
| 二九 | 兵工廠一瞥····· | 一〇三 |
| 三〇 | 他們向所未知的事情····· | 一〇五 |
| 三一 | 簡直沒有時間唱歌····· | 一〇七 |
| 三二 | 跟彭德懷在一起····· | 一〇九 |
| 三三 | 游擊戰的起因····· | 一一〇 |
| 三四 | 游擊隊的革命特質····· | 一一三 |
| 三五 | 紅軍是不可克服的····· | 一二三 |
| 三六 | 戰線上的指針····· | 一二四 |

一 神祕的中國在哪里

我在遠東八年期間，大部分時間耗費在中國，關於中國共產黨運動，曾發生好幾百個問題，可是大部分都沒有得到解答。在這些年頭中，恐怕在國際間，沒有比中國紅軍的故事更神祕的了，恐怕沒有比它更偉大的沒有寫成的新聞史詩了。

中國蘇維埃，在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國家的正中心，正在戰爭着，可是九年之間，竟被如同堅石砲壘一樣有效的新聞封鎖，和外邊隔離起來。百餘萬的國民黨軍隊，組成一座活動的長城，永遠包圍着他們；他們的區域，似乎比起西藏來，更難達到，沒有人穿越過這座長城，而回來寫過他的經歷。

即使在最簡單的各點上贊成和反對的黨人們，都爭辯過，但是對於尋找客觀真理的人們，雙方却都缺乏可靠的證據。下面是每個關心東方政治的人最感興趣的幾個問題。



二 紅色中國是什麼

我們先從什麼是紅色中國這一問題開始說起

這樣的一個名詞，能正確地用在討論那些浮泛不定，時常改變的中國內陸地帶嗎？這些地帶，促進了中國紅軍的永遠繼續增長的活動。這個名詞能夠適用到現在在紅色統治之下的西北的廣大地域嗎？

在事實上，中國究竟有一個像紅軍這樣的軍隊嗎？是一個訓練好了的，服從一個綱領，在中國共產黨統一指揮之下的軍隊嗎？如果是這樣，那麼，這個綱領是什麼呢？共產黨肯定說他們自己是反對法西斯蒂爲民主政治而戰爭的。獨裁者×××就說他們只是有知識的土匪而已。誰是對的呢？或者說兩方都對嗎？一九二七年以前，國民黨被允許參加共產黨，共產黨也被允許參加國民黨，但是在那年的四月裏，開始了有名的清黨運動。當時在×××軍總司令×××領導之下，共產黨，以及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黨和成千的組織起來的工人和農民們，大規模地被屠殺了。從那時起，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同情者，都成了可用死刑處罰的罪案，而且已經有成千的

人受到了這種處罰。然而更有萬千的人，仍舊繼續冒險，參加紅軍反抗×總司令的鬥爭。爲什麼呢？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中的基本矛盾，是些什麼呢？

至少，中國共產黨像什麼組織呢？他們在什麼情形下，和各國的共產黨或社會主義者相同呢？在什麼情形下，他們和各國的共產黨或社會主義者不同呢？遊歷者常問：是不是他們留蓄長的鬍子？是不是喝湯的時候吵嚷？是不是在他們的行囊裏帶着自製的手榴彈？心思深遠的人想知道他們是不是「真正」的馬克斯主義者。他們讀過資本論和列寧的著作嗎？他們對斯達林和托洛斯基的思想是什麼；他們的運動，真正是世界革命的機構的一部分嗎？他們是真實的國際主義者呢，或者只是爲一個獨立的中國而鬥爭的國家主義者呢？

這些戰士們，這樣長期地戰爭着，這樣兇猛地，這樣勇敢地，一句話，這樣所向無敵的戰爭着，如同被各種彩色的觀察者，以及×總司令自己的部下所私自承認的那樣，到底是些什麼人呢？什麼使他們這樣地戰爭着？什麼東西抓住了他們？那些使他們變成這種讓人難信地頑強的戰士的希望，志願，和夢想，是些什麼呢？（和中國特有的妥協精神的歷史比較起來，這是使人難以相信的。）他們經歷了好幾百次的戰爭，封鎖，鹽的缺乏，糧食的缺乏，疾病和流行病，最後又經歷

了有歷史意義的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在這長征中，他們越過了中國十二省，衝破了成千成萬的國民黨軍隊，最後在西北——他們的新的根據地——勝利地出現了。

誰是他們的領袖？這些領袖們是在一種理想和主義上，有着沸騰着的信仰的受過教育的人嗎？或者僅僅是些沒有知識的農民，盲目地爲生存而戰爭？舉例來說，在南京名單上第一名「紅匪」毛澤東，是什麼樣的人呢？蔣介石曾經爲捕獲、生擒或者打死他，懸賞過二十五萬元啊。在這個價值最高的東方頭顱中，裝着一些什麼東西呢？其次，朱德——紅軍的總司令——他的生命對於南京也有和毛澤東同樣的價值，又是什麼樣的人呢？還有許多別的紅色領袖們，他們曾被屢次地傳說着已經死了，可是又在報上出現，不僅毫末受傷，而且指揮着新的反抗國民黨的軍隊。這些領袖們，又是什麼人呢？

什麼東西可以說明他們的反抗着比他們優越許多的軍事組織這種的驚人的記載？沒有——一個工業根據地，沒有大砲、毒氣、飛機、金錢，和現代的技術——這些東西，南京已經在他們反共的戰爭裏，都利用了——他們是如何地生存下來，而且到今天，增加了他們的聲勢的呢？誰給他們當顧問？在他們當中有些俄國的天才軍事家嗎？他們不僅擊退了一切送去征討他們的國民

黨軍隊的指揮官們，並且也曾打敗了×××的龐大而用費很多的外國顧問團——這團部以前是由希克特 (Von Seekt) 將軍率領的，希克特將軍現在就是希特勒的國防軍的領袖。

中國蘇維埃是一種什麼組織？農民們擁護它嗎？在他們已經集中了他們的勢力的區域裏，紅黨們實行「蘇維埃化」到了何種程度？為什麼紅黨們沒有佔領大的城市？這層是不是證明：他們不是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而主要地只是一種農民的反抗呢？在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仍然是從事於農業的，而工業資本主義仍然還在牠的襁褓中，如何談得到「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呢？

紅黨們怎樣穿衣、吃飯、遊戲、戀愛、工作呢？他們的婚姻法律是什麼呢？婦女們是如國民黨當局所宣傳的那樣被「共」着嗎？中國的「紅色工廠」是什麼？「紅色戲曲社」是什麼？他們如何組織他們的經濟？關於公共衛生、娛樂、教育、「紅色文化」等，又是如何呢？

最後，紅軍現在的實力如何呢？牠從那裏得到器械和軍火呢？假如，像蔣總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佈的，南京已經「摧毀了共匪的威脅」，那麼，如何解釋：今日紅黨佔據了一個較以前任何時候都龐大而統一的區域，一個在中國最有戰略價值的西北？假如紅黨是被消滅了，那麼，爲

什麼日本作為有名的廣田三原則中的第三項，要求南京和東京（也和德國）訂結反共協定，『防止亞洲的布爾塞維克化』紅黨們真是反日的嗎？

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運動和政治運動的前途，是怎樣呢？牠是一種歷史的有力的發展嗎？如果是的，那麼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成功呢？雖然牠經歷了長期地奪取政權的鬥爭，牠能成功嗎？但是，假如牠已經是成功了，那麼，加上在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這種重大的變化，牠的結果影響會如何呢？在世界政治上，在世界歷史上，牠會產生什麼變化呢？牠會如何地影響英美及其他外國在中國廣大的投資呢？

在過去，這是一件覺得可笑的事：為什麼沒有一個局外的觀察者，能夠確切回答這些問題。這是一個興趣和重要性日益增長着的問題。這正是中國的故事，如同新聞通信員，在拍發關於瑣碎的側面觀察的稿件中，彼此互相承認的。但是我們在過去都是可怕地不知道牠。在白區中和共產黨接近，是非常艱難的。在頭上懸着死刑的共產黨，在中國社交上，是不公開承認自己是的。而且即使是在外國的租界裏，南京也有廣大的偵探組織在工作着。舉例說吧，像巴區里克·傑文斯（O. Patrick Givens）這樣的警狗，也是被豐富地報酬着的。他是上海英國警察隊紅

黨緝捕者的領袖，在他手下，有許多的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員被逮捕，以後被監禁或被槍決了。

三 只有親身走一趟

我們都知道：想知道一點紅色中國的事情的唯一法子，只有到那裏去一趟。可是我們都原諒自己說：『沒有法子，』『辦不到。』人們都相信：沒有人能走進紅區，還能活着走出來。這就是幾年反共宣傳的力量。在這個國家裏，牠的新聞，是和在意大利或德國一樣地被嚴厲地檢查和統制着的。

但是這種情形，在外國是不贊成的，特別是在美國，那裏對於中國紅黨的興趣，一天天地增加。兩年以前，美國出版者哈利遜·施密士（Harrison Smith）對我提出一個建議，請我著一本關於中國紅軍的書，而我在一時的樂觀中，接受了這個提議。但是，從未看見過紅軍而來寫牠，（像有些人這樣做過的）對於我，似乎覺得是不合法的，後來我不得不向施密士先生說明搜集可靠材料的困難，但他不能瞭解。他是太性急了，他想知道：爲什麼我不『只要買一張車票，走到紅色中國裏去就是了？』

但是，可憐得很，沒有人供給任何的車票；而且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似乎合同永遠不會被履行了。後來突然地我得到了走進紅區的一種可能的辦法的消息。這種辦法需要立刻動身，拋棄我在北平的職務，放下我一本正在寫作而且幾乎快要完了的書。這個機會實在是太可珍貴了，是不容許放過的。我不再遲疑地決定了接受了牠，企圖着要打破這種九年來的新聞封鎖。

這自然是帶有某些種危險的，但是我決定相信讓報紙登載我的死的消息——『被土匪殺死了』——是多少有些言過其實的。對着充滿了被津貼的本地報紙和在中國的外國報紙上的許多關於紅色殘忍的可怕的故事，我是沒有一點點意思起程的。但是，最後我想：在這些年頭，已經有成千成萬的生命，被犧牲在革命戰爭中了，一條外國人的生命，也許能僥倖，努力尋出爲什麼的原因來吧？

我是在這種多少帶點衝動的情緒之下出發了。

四 故都以外的人類脈膊

是六月初旬，北平正披着春的綠帶，密叢叢的楊柳和皇宮的柏樹，使紫禁城變成一個奇妙

和媚人的地方。在這裏人們很難相信，在這個崩潰的中國，皇宮發光的屋頂的以外，有着勞苦，飢饉和革命。北京的某種魔術，使着外國人在這個舊都一年復一年地住着，永遠不會意識到在牠的靜穆的隔絕的城牆以外的人類的脈膊。

然而在剛過去的這一年，即使在北平這塊沙漠中的樂園，也被那籠罩着全中國的鬥爭的氣焰侵入了。日本侵略的威脅，激發了人民的大的示威遊行，特別是在怒火中燒的青年學生之間。全北平的防禦組織，不能制止對於紅軍走經山西，開始抗日戰爭的驚人的企圖的響應——這企圖被蔣介石委員長的軍隊禁止了。英勇的學生們，追求着監禁和死刑，在街道上集會着，高喊着『抵抗』並且呼出『停止內戰！與共產黨合作共救中國！』等等違禁的口號。

一天半夜裏，我跳上一輛破爛的特別快車，覺得略有點不舒服，可是在一種高度興奮的狀態中。興奮是因為在我的前面，擺着一個，空間離開封建繁華天子之城幾千里外，時間距離幾百年的地域去的一個探險旅行。我是向着『紅色的中國』出發。

然而有點不舒服，因為我已經施用了一切可能有的注射了。我的血流一定是像一個遊行的醫院，我的手和腳被注射着預防天花、腸熱病、虎列拉、瘧熱病，和流行時疫的藥針。這五種病在

西北都是很流行的，而且，最近傳說在陝西有魚口疔的傳播的驚人報告。在那裏這一種病是種風土病，患者很容易死去。如果這種冒險是值得的話，這是另一件事不必管牠；可是被一個跳虱咬傷而病倒，是再滑稽沒有的事了，這我想是誰也會承認的。

五 最近的目的地——西安

我最近的目的地是西安府——這個名詞的意思是西邊的安樂鄉。西安府是陝西的省城，在北平西南，去要兩晝夜的疲倦的火車路程，牠是隴海路西端的終點。從那裏我計劃着往北走，走入蘇區。這蘇區現在佔據遼闊西北的正中心。在實際上，這是紅軍首次佔有的最大的整個區域，由於一種奇怪的歷史的原因，這些在陝西北部，甘肅東北部，寧夏南部的蘇區，幾乎符合中國發源地的原有邊境。因為在過去，幾千年以前，中國人在這裏開始組織，統一了他們自己，成爲一個民族。

平漢快車是很可憐的。車上的電燈設備失掉了作用，車掌不能說出的毛病所在；它在最後一次從漢口開回來的時候，就不能再用了。在車廂和走廊裏，都點着蠟燭，光線還可以對付，可

是因爲不能夠打開窗戶，所以空氣的流通是很少的。我歎着氣，這一次列車，比較起七年前我頭一次在平漢線上坐的那一次來——那一次我是拿南京政府的一個客人的資格而旅行的——是更不可形容的一種列車了。

那時候鐵道部長是孫科博士——國民黨最大的領袖孫逸仙的長子。孫科請我作一次國有鐵道的旅行，並且還要我寫一篇關於他的文章，我也寫了，認爲前途是很有希望的。那時候政府是充滿了去實現孫逸仙全國敷設十萬里新的鐵路的驚人夢想的計劃……但是在今天，不僅沒有新的鐵路，中國所有的鐵路，比起一九二九年來，已經更少了，因爲幾年前當日本佔領滿洲時，無抵抗地損失了所有的鐵路的里數的百分之三十。

早晨，我考忖了一下我的旅伴，看見了一位青年和一位很好看的有一把白鬚子的老人，他們對着我坐着，喝着苦茶。一會兒，那個青年和我說起話來。開始的時候，是說些禮貌的客套，以後不知不覺間說到政治上去。我發現了他的妻子的叔父，是一位鐵路上的職員，他是用一張免票來旅行的。他要回四川去，四川是他的故鄉，七年沒回去了，可是他不敢決定究竟能不能再回他的故鄉，據說土匪在那裏附近活動着呢。

「你是說紅黨嗎？」我問他。

「不，不，不是紅黨，雖然在四川也有紅黨，不是說紅黨，我是說土匪。」

「可是紅黨不也是土匪嗎？」由於好奇心，我這樣問他。「報紙上總是叫他們做赤匪，或者是共匪。」

「啊！你必須知道：報紙編輯們必須叫他們做土匪，因為是南京命令着他們這樣做。」他這樣地解釋着。「假如他們叫他們做共產黨或者是革命者，那麼這樣就證明他們自己也是共產黨了。」

「但是在四川，難道人民不和怕土匪一樣地也怕紅黨嗎？」

「這層要看情形如何。富人們怕他們，同時，地主們，政府官吏們和租稅的徵收者們也是怕他們的。但是農民是不怕他們的。有時候他們甚至歡迎他們。」說到這裏，他機警地警視了那位老人一下，這位老人坐在那裏很注意地聽着，雖然表示着好像沒有聽見的樣子。他繼續說：「你看，農民是太沒有知識，不明白紅黨只是想利用他們；他們以為紅黨真的和他們嘴上所說一樣。」

「他們不認真要實行嘴上所說的嗎？」

「我父親寫信告訴我，他們在松潘（四川）真的廢除了高利貸和鴉片，告訴我在那裏他們把土地重行分配了。所以，你看，他們不是土匪，他們有很對的主義，可是他們是惡人，他們殺的人太多了。」

這時候，白鬍子老頭，很驚奇地抬起他的和善的面孔，用一種很莊嚴的神氣，說了一句驚人的話：「他們殺的還不夠！他們殺的還少！」我們兩人都帶着詢問的態度注視着他。

不幸得很，車已經走近鄭州了，在這裏，我必須改換隴海路的車，我們不得不中斷這個討論。可是我以後總是驚奇着這位帶着孔子面貌的老人，怎會提出這麼一個驚人的見解。我旅行的第二天，一整天都在想着這件事。我們很慢地爬過在河南和陝西的黃土山的神祕坡面，直等到我坐的火車——這列車是很新而且很舒服的——滾到了新近築成的漂亮的西安火車站。

六 楊虎城與邵力子的訪問

我到了以後，不久就去拜訪綏靖主任楊虎城將軍——楊將軍在兩年以前，無疑地是在陝

西那些沒有被紅黨統治的區域裏的『皇帝』

但是最近他不得不同幾個在西北的別的大人先生們，分享他的權力了。因爲在一九三五年，少帥張學良——他從前是多年的滿洲的統治者——把軍隊帶入了陝西，而且就任了在這一帶的最高權位的紅黨驅逐者——即全國剿匪副司令。而且隨着少帥來了邵力子——蔣介石委員長的一位副手。這位邵先生是陝西省政府主席。

在這三個和一些其餘的人物之間，保持一種很細膩的勢力均等，而在他們全體的背後牽扯繩子的，是可怕的委員長本人，他努力着伸張他的獨裁到西北去，而且要毀壞年青的蘇維埃民主政治。

邵主席在他的很寬大的街門的花園裏接見我，在西安塵土街道上的焦躁的炎熱之後，花園裏是很涼快舒服的。我過去最後的會見他，是在六年以前，那時候他是蔣介石的私人祕書，他曾經幫助我謁見委員長，從那時起，他很快地在國民黨裏高升起來了。他是個有能力的人，受過很好的教育，委員長現在加給他省主席的榮位，但是可憐的邵力子，和其他省主席一樣，不能伸張他的統治權到省城的灰色的牆以外，在這以外的區域，被楊將軍和少帥分去了。

或者提這件事是不敬的，邵先生自己曾經一度加入『共匪』實在說來，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但是對他不應責備過嚴了：因為在那時候，當共產黨是很時髦的，而且沒有人確實知道牠真是什麼，祇知道一切前進的青年都是共產黨。後來他退出了，因為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以後，共產黨的意義，成爲很明朗了，而且你會把你的腦袋爲此犧牲的，邵以後變成一位虔誠的佛教信徒。以後他沒有再表現別的信仰的態度。爲什麼在我們的談話裏，他沒有一次用『土匪』兩字來提到紅黨——這可以拿他以前曾一度參加過革命來解釋。

『紅黨的情形是如何？』我問他。

『他們沒有剩多少了。在陝西的這些，僅僅是些殘餘。』

我提醒他說，在一九三〇年，我和他會面的時候，紅黨也是說只是殘餘了。這種殘餘的長命，如何來解釋呢？

他很詭詐地看着我，發着笑，『有時候摧毀殘餘，比起摧毀全體來更難。』他解釋說。

『那麼，戰爭繼續進行着麼？』我問。

『不，現在陝西沒有戰爭。紅黨向寧夏甘肅移動着。他們似乎想和外蒙取得連絡。』

他把談話轉到西南的政局上，在那裏叛逆的將軍，那時候正要求着北上抗日。我問他，不是他以為中國應該和日本戰爭。『我們能夠嗎？』他追問着。接着他老實告訴我，他對於日本的感想不便發表——正如每一個國民黨官吏，會把他關於日本的意見告訴你，但不便發表一樣。當我們交換的意見，險些兒互相接近同意的時候，我祇好告別了。我已經從邵力子知道了我想知道的東西。他已經證實了我的北平情報者的話；在陝北的作戰，已經暫時停止了。所以，如果很好地安排一下，到前線去，應該是可能的。我接着就進行辦理手續。

所以不久以後，我便離開了『西邊的安樂鄉』，坐在一些國民黨兵士的中間，在一輛軍用汽車裏，向着『剿匪』前線進發。

七 向西安北部而去

我們在黎明以前離開西安府。高的木門從前一度叫做『金城』的，在我們的軍事護照的魔力之前打開了，而且鐵鍊的響聲很大。

在黎明前的半明半暗中，我們的汽車走過了飛機場，這裏的飛機每天出發，在紅區上空偵

查和投彈。

往前再走幾千碼，我們就達到漢朝（紀元前二〇六年到紀元後二二〇年）定都的舊址的邊界了。在坍塌的城牆裏，一個大的土邱上就是那漢武帝的皇宮寶座，你現在還可檢到從這些二千年以前的高貴的屋頂掉下來的瓦片。

一個中國旅行者，在西安往北這條路的每一里路，都是引起對於古時候人民的富足和有聲有色的表現的感想。最近中國歷史上的突變——共產主義運動，選擇了這個地域來賭賽它的命運，似乎是得當的。

在一個鐘頭之中，我們渡過了渭河。在渭河河床流域，從前中國的祖先們，最早開發他們的米的種植，並且形成了一種在今日農業的中國的民間神話中仍然有勢力的風俗。快到正午的時候，我們達到了中部，那個高超而可畏的最先『統一』了中國的人物——秦始皇，就在大約在二千二百年以前，生在這個雉堞的城池的左近。秦始皇建築了中國的長城。

沿着這條新近完成的馬路邊，鴉片罌粟花點着它們膨脹起來的頭，已經成熟等待收穫了，這條馬路已經帶着被水沖刷的和車轍很深的皺紋，所以有時候，甚至於我們的六噸重的道濟

汽車，都幾乎通不過，陝西很早就成了有名的鴉片省分。在幾年前西北大飢饉中，三百多萬人民的生命失掉了，美國紅十字會的調查員，把這種慘劇的大部分責任，歸罪於貪求捐稅的軍閥們，強迫人民種植鴉片的結果，這完全是真的。最好的田都專用到種罌粟花上去了，小麥、蕎麥和玉米，本來都是西北的大宗產物，然而在大旱之年，竟極端缺乏。

我在洛川一家很鄙陋的客店的土炕上過了夜。第二天一早晨出發，離城幾里以外，黃土的高隴越起越高，越來越莊嚴，境地是在神祕中改變了。

這種黃土地帶，包括着甘肅的大部，陝西、寧夏和山西諸省，這些地域的驚人的肥沃的原因——當有雨的時候——就是因為這種黃土，供給數十尺深的肥沃的多孔的上層地面。地質學家以為這種黃土是好幾百年前從蒙古及西方被起於中央亞細亞的大風所吹來的一種有機物質。在景緻上，這結果是成爲一種極端千奇百怪的，築成形狀——山是像些大的礮臺，像許多排大象一樣的很圓的堡壘，像被某種大手撕壞的大山脈，留下些發怒的手指的痕跡。發狂的，神祕的，有時候又驚人的形狀，像被在發瘋的船上的希臘酒神們所造成的世界一樣。

雖然在每個地方，你都能看到田園和耕種了的地，可是你很少看到房屋。農夫們也被這些

黃土山圍封着看不見了。普遍了西北，人們已經住在從神秘奇幻的山崖掘出來的洞裏，安立了他們的家，這無疑地已經是幾世紀的習慣了。這些「穴宅」，中國人叫它做「窯房」。可是它們不是像西洋人的意義上的「穴宅」一樣。在夏天裏很涼快，冬天裏很暖，是很容易建築，很容易清掃的。即使最富裕的地主們，也常常在山裏掘立他們的家。它們之中，有些是有許多房屋的偉大建築物，很闊暢地佈置裝飾着，有石頭的地板，高大的天棚，經過黑漆大門，光線從在土牆上所開的粉蓮紙糊的窗戶中透過來。

有一次，離洛川不遠，一個在我身旁坐着很堂皇的汽車的國民黨軍官，用手指給我一個這樣的「窯房村」。它離汽車路只有一英里路的光景，那裏是一個很深的山谷的過道。

「他們是紅黨，」他說：「在幾個星期以前，我們的一個聯隊被派到那裏去買小米。這些村裏的人，拒絕賣給我們一擔。蠢的兵士們用武力搶了一些。當他們往回走的時候，他們對他們開槍了。」他揮動他的手做一個弧形，包括了在大路上兩旁的一切東西——這大路是由國民黨軍隊十幾個堡壘所守衛着的——「在那一帶都是共匪區域。」

我用更尖銳的興趣，注視着他所指示的地方。因為在幾點鐘後，我要進行的道路，正是那一

帶不相識的山脈和高原。

八 赤都延安

第二天下午，我們達到了延安（膚施）這裏是陝北唯一能走有輪的車輛道路的盡頭——長城南二百上下英里。他是一個歷史上的城地，在過去好幾世紀，游牧的侵略者，從北方經這裏走來。成吉思汗，在他對西安征服的進軍中，在這裏經過，曾橫掃過他那高大的蒙古騎兵隊。

延安是很理想的，適合於防禦。他是盤據在一個高的石質的沿山的中間。堅固的城牆爬到這些山的絕頂。角上新築成的砲壘上的機關槍，對着不遠的紅黨聳立着。那時候，公路和緊接公路附近還是國民黨軍隊所有，但是最近延安完全失掉對外的連絡了。紅黨把委員長強迫加在他們身上的封鎖掉轉過來，加在委員長的一些軍隊身上了，有好幾百人被因而死於飢餓。

即使是飛機，對於圍城的紅黨，也證明了完全沒有用處。紅黨在山頂上安置着機關槍——因為沒有高射砲——他們機關槍運用的這樣準確有效，使敵人的飛機的駕駛員，強迫着不得不在極高度上飛行，以致於他們企圖扔到城牆以內去的糧食的包捆，因距離目的地太高了，

實際上，大部分都落到紅黨的手裏，他們在延安城門以外，開闢了一個市場，把這些食糧賣回給被困的居民。張學良的外國飛機駕駛員，因為被射擊而懼怕了，一個美國人竟因此辭職。當我在西安看見了少帥的美麗的播音私用機，佈滿了子彈孔，我對他那駕駛員祇有同情。

我到延安前幾個禮拜，紅軍對延安的長期的圍攻，才解開了，但是在飢饉的容貌的居民身上，在空的架棚上和堵塞了的商店的門上，圍攻的痕跡仍然是很明顯的，城中只有很少量的糧食，而價錢是很高的。那時一切能夠買到的糧食，都是由於與紅色游擊隊暫時休戰的結果而得到的。爲着換得政府在這方面戰線上不對蘇區採取攻擊，蘇維埃農民現在才把糧食和蔬菜賣給飢餓被困的南京軍隊。

九 衝進了紅色的門戶

我有一張到前線去的護照。我的計劃是第二天一早就離開縣城，走到『白』色前線上去，在那裏政府軍隊，僅僅只守住他們的位置，而不企圖任何的前進。以後，我想從山裏的街巷中的一條岔道過去，從那裏，人們說，就是商人們私運貨物，出入蘇維埃區域的要道。

實在說，當一個國民黨的黨徒和我一起走的時候，而能像我的希望，經過最後一個步哨而走到無人區域去，本來是很難的。但是經驗告訴我，中國的一切事情，祇要用中國的法子去應付，沒有辦不到的。因此我在第二天的早晨七點鐘，居然把國民黨的機關槍守備隊撤在後面，而行經一條紅白分界的小徑上了。

我是同一個在延安僱的脚夫一起走。他允許把我所有的很少的東西——一個行軍床，很少的一點食物，兩個照像匣子和二十四捲膠片，帶到第一個紅軍游擊隊的前哨。我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一個紅匪或白匪——但是他確像一個土匪。這一個地帶，好幾年了，由這兩種顏色的軍隊，交相統治着，他很可能的是這兩種土匪中的一個，或者兩種都是。我決定了最好不問不相干的問題，只馴服地跟隨着他，期待最好的事情。

四個鐘頭，我們完全沿着一條屈轉的小河行走，而且看不見任何人類生命的記號。幾乎是沒有路，僅僅只有河床，牠在兩岸高的石頭牆之間奔流着，而在牠以上，黃土的山很快的升起來。這正好給一個好事訪求的洋鬼子的一個好安置。祇有一件最引起不安的事件，就是脚夫對於我的牛皮鞋，不斷地表示讚美。

『到啦！』他突然地圍着我的耳朵喊着。石頭的河岸最後消失了，展開了一個狹小的山谷，嫩小的麥子綴成一片青色。『我們已經到了！』

心情放鬆了。我注視周圍，看見在山旁邊的一個黃土鄉村，在那裏藍色的烟，從高的土烟肉向上捲。烟像是些長的手指，迎着山崖的前面直上雲端。幾分鐘後，我們就到那裏了。

一個年青的農夫，在頭上戴着一塊白布的頭巾，腰上掛着一枝手槍，走了出來，很驚奇地看着我。問我是誰，我要做什麼？

『我是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我說，『我想要會見本地窮人會的領袖。』

他的臉貌和善了，我看見他是很年青，有一個好看的黃銅色的臉皮。但是他不像屬於中國內地那種畏縮的農民。在他的快樂的發光的眼這，有種挑戰的神情和某種勇氣。我很高興的看見他慢慢地把手離開他的手槍把，他露着白牙齒發笑了。

『我就是那個人，』他說，『我就是本地的領袖。走進來喝點熱茶吧。』

坐在他家裏墊着氈子的坑上，我關於我自己和我的計劃，更進一步的對他說明了。他好像很快地就相信了。我想到安塞去，那是縣城，我相信那時候毛澤東在那裏，他能不能給我一個嚮

導和一個脚夫？

『一定，一定，』他同意了，但是我是不要在日中的炎熱裏的。太陽已經爬到正午的中天，而且，難道我已吃過了嗎？實在我是很饑餓的，不帶一點更多的客套，我領受了他的宴請。

我的脚夫很急於要回到延安，我付給他錢，和他告別了。這是在將要來到的幾個星期裏，對於我和白色世界的最後的聯繫告別了。我已經越過了『紅色的疆界。』

我現在是完全在劉龍火先生掌握之下了——我聽見這青年農夫這樣地被人們叫着——也是在他的一些粗壯的同志們的掌握之下。這些人從附近的窰房裏，開始鑽進來了。穿着同樣的服裝，佩着同樣的武裝，他們都奇怪地看着我，笑着我的外國聲調。

劉請我吃烟、酒和茶，追問我許多的問題。他和他的朋友，帶着很關切的興趣，問着讚美的呼聲，查看我的攝影機，我的鞋，我的毛襪，我的棉褲衫的格紋。他們的一般的印象，認為這些東西雖然好像很可笑，但大體上很適合牠們的用處。我不知道，對於這些人，在實行中的共產主義的意義是什麼；所以我在等着眼看我的所有物，很快地會被『共產』了——但是，自然，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據我所能下斷語的，我所遭受的這種細密查驗的目的（這是比在別的邊疆所受的

海關查驗，要快樂多了。）是爲着加強『外國鬼子是不可捉摸的』這種固有的信念。

一點鐘以後，來了一大盤的炒雞蛋、熱花捲、小米粥、白菜湯和一點燻肉。我的主人爲飯菜的簡陋道歉，而我却爲非常的食慾道歉。

龍火告訴我，到安塞『只有幾步路遠。』因爲他固執着他的意見，我雖然是不放心，但我除了等着以外，沒有別的辦法。後來終於一個年青的嚮導露面了，跟他來的還有一個驢夫；時間已經過了下午四點了。在出發以前，我要給劉吃東西的錢，但他很莊嚴地拒絕了。

『你是一個外國客人，』他解釋着說，『並且你是和我們的毛主席有公幹的。再說，你的錢也不好。』看着我給他拿出來的票子，他問，『你沒有蘇維埃的鈔票麼？』當我答覆沒有以後，他數出值一塊錢的蘇維埃紙幣，『這個，你在路上是會要用牠的。』

劉先生收下了一塊國民黨的錢作爲交換，我再謝謝他，跟在我的嚮導和驢夫之後，我走上了我的路程。

『很好，』當我跑上山以後，我對我自己說，『直到現在爲止，一切都是很好的。』我已衝進了紅色的門戶。這是一種如何簡單的手續啊！

但是在途中，我遇着意外發生的事情我僥倖的逃脫了。這件事情以後，就造成了我被土匪搶了或殺死了的謠言。事實上，在這裏安靜的黃土牆之後，土匪們——不是紅色的，而是白色的土匪們——早已追蹤着我了。

一〇 紅區第一夜

「打倒吃我們的肉的地主們！」

「打倒喝我們的血的軍閥們！」

「打倒把中國賣給日本的漢奸們！」

「歡迎和一切反日軍隊的聯合陣線！」

「中國革命萬歲！」

「中國紅軍萬歲！」

在這些有點動人的，用大的黑字裝飾出來的標語之下，我的命裏造定要在紅區裏，過我的第一夜。

但是這不是在安塞，也不在任何的紅色兵士保護之下。因為，正如我所怕的那樣，那天我們沒有達到安塞。在太陽落下去的時候，我們僅走到躲在河灣裏的一個小村莊，四圍聳立着些沉默而黑黯的山。幾層石板屋頂的住宅，在溪岸矗立着，在這些房子的泥牆上塗寫着許多標語。六十個農民和注視着的兒童們，湧了出來，迎接我們這祇有一個驢子的旅客。

我的年青的嚮導者——你要知道他是窮人會的一個密使——決定把我安置在這裏。他說，他的一個母牛最近產下一個小犢，隣近的地方有狼，他必須要回去安排一下。到安塞還有十英里路遠，我們不容易在黑暗中走到那裏。他把我委託給本地窮人會的主席安爲保衛，嚮導和驢夫都拒絕領受對於他們的服務的報酬，不論給他們白色錢或紅色錢。

支會主席是一個剛過二十歲的青年，黃色的面孔，穿着一件退了色的藍棉布背心，有一隻堅韌的赤脚，穿着一條白褲。他很歡迎我，而且對我很和善。他在村子的接待室裏給我安置了一間房子，並且給我送來一些熱水和一碗小米粥。但是我不喜歡這間黑暗而且氣味不好的房子。請求給我兩扇卸下來的門。我把這兩扇門放在兩條板凳上。打開我的被褥，在露天搭了我的床。這是一個美麗的夜間，在清朗的天上，煌耀着北方的許多的星。在我下面的小瀑布，好像正低聲

歌唱着平安和寂靜。由於長期間的行走疲乏，我馬上就睡着了。

—— 白色土匪

當我再打開我的眼睛的時候，天已經破曉了，窮人會的主席站在我跟前，搖我的肩膀。自然，我被驚動了，立刻坐了起來，完全睡醒了。

『甚麼事？』我問。

『你早一點走，』他勸告我。『最好早一點離開這裏，這裏附近有土匪，你應該快一點到安塞去。』

土匪？我正要答覆他，說我此來正是爲的要會見這些所謂土匪的。可是我一轉念間，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不是說紅黨，而是指白黨。他的意思是指『白色的土匪。』我不用他再加勸說就起來。我不願意發生在蘇維埃中國裏被白色土匪擄去的笑話。

讀者須知，用××黨的名詞來說，白色土匪就是『民團。』爲着努力鎮壓農民暴動，××黨逐漸組織這些民團隊伍了。他們的功用就是『保甲』制度裏的組織的一部分。這種『保甲』

制度是一種統治農民的舊式方法，現在被××黨在中國，和日本在滿洲國，很廣地採用着了。

按字面來講，『保甲』是『保障的甲冑』的意思，這樣的一種制度，規定着每十戶農家，必須要有一個首領，由這個首領，維持對農民們的威信，使本地縣官滿意。這是一個彼此互相擔保的制度，所以保甲裏的一個人犯了法，對保甲的全部或任何一部都要負責的。這就是蒙古人和滿洲人，統治中國成爲他們的大帝國的方法，也就是南京想統治中國成爲一個『共和國』的方法。

用這方法來防止農民組織反叛，幾乎是再好沒有的了，因爲保甲的領袖，幾乎永遠是富農，地主，和高利貸者的——這些是××黨的最熱烈的國民。所以很自然的，不願意『擔保』任何有着叛逆傾向的佃農和負債的農民。但是不被擔保，是一件很嚴重的事。一個沒被擔保的人，在任何籍口之下，都能被當做一個『可疑的份子』而投進牢獄的。

這就是說，在實際上，整個的農民階級，是被放在地主和高利貸者的掌握之下。他們在任何時，都可以用拒絕擔保的辦法來摧殘人民。現在，保甲制度的職務裏的一種，而且是很重要的的一種，就是爲支持『民團』的捐稅的徵收。民團是由地主們挑選，組織，指揮着的。牠的最主要的責

任是和共產黨打仗，幫助徵收地租和分享收穫和債務，收取放款和利息，協助縣政府收集不斷增加的軍閥捐稅。

這樣，當紅軍佔領一個區域，牠的自始至終的敵人就是民團。因為民團除了供應他們錢的地主們以外，是沒有基礎的。自然，這種基礎，當紅軍來了以後，就失掉了。中國的真正的階級鬥爭，可以在民團和紅色游擊隊之間的戰爭裏，最容易看出來。因為在這裏，很普遍的是地主們和他們以前的佃農和債務者之間的直接武裝衝突。民團的數目，有幾十萬，是二百萬中國正式反共軍隊的最重要的助手。

現在，雖然在這方面戰線上，紅軍和國民黨軍隊有一種停戰協定，但民團對紅色游擊隊的攻擊，是時來時往地繼續着的。在西安、洛川、和延安，我聽見有好幾百逃到這些城裏去的地主們，現在正籌劃或親自領導白色土匪，在蘇維埃邊境區域裏活動。找紅軍主要部隊不在的機會，他們常常衝進紅色區域，焚燒搶劫鄉村，殺戮他們捉獲的農民。農民領袖們被捉帶到白區，在那裏地主和白色軍官們，給與俘獲這種的『共產主義者』的人一些重賞。

從事於突然的進攻，和很快的搶掠撤退，被民團認為是紅白戰爭中最富破壞性的工作。無

論如何，我沒有想用我自己去試驗白色土匪的『外交政策。』雖然我的所有物是很少，可是我覺得我的很少的一點錢，我所有的衣服和我的照像機，一定很能證明是足以引起他們的注意，因為祇要除掉了一個孤獨的洋鬼子，便可以把這些東西據為己有。

一一 第一個紅色戰士

急匆匆地吞嚥了些熱茶和麥餅，我和支會主席所派的另一個嚮導和驢夫一同出發了。我們隨着河床走了一個鐘頭，偶爾經過小的洞穴村落，那裏有長毛的本地狗，很威脅地對我叫着，兒童守望者走出來盤問我們的『路證』——通行證。接着我們達到一個清靜的可愛的池邊，在這裏看見了第一個紅色戰士。

除了一匹好看的白馬，站在水旁吃草以外，只有他一個人。這個青年人正在洗澡。當着我們來到的時候，他很快地跳起，披上天藍色的大褂，和一块白布的頭巾，在頭巾上有一顆紅星。在他的屁股上掛着一把手槍，一些紅的穗子很輝煌地在木盒子柄上拖着。他把手放在他的槍上，等着我們向他走去，對嚮導者盤問我們的任務。嚮導者拿出他的路證，簡單地解釋他怎樣護送着

我。紅軍戰士很好奇的注視着我，等着更進一步地解釋。

「我是來見毛澤東的，」我解釋說，「我知道他在安塞。我們到他那裏還有多遠呢？」

「毛主席嗎？」他慢慢地問着。「不，他不在安塞。」於是他注視我們的後面，看看是不是只單獨是我們。相信了我們以後，他的顧慮消失了。他笑了，好像有某種祕密的快樂似的。他說：「我正要到安塞去。我願意和你一塊到縣政府去。」

他騎着他的馬在我身邊走，我自告奮勇地再詳細地介紹我自己，也冒昧地問了他一些問題。我知道了他是在「政治保衛局」裏做事的，正是在這條邊境上巡邏值勤，馬是張學良的禮物。他告訴我，在陝北最近的戰爭裏，紅軍從張學良的軍隊俘虜了一千多匹馬。我更知道他是姓姚，二十二歲。他已經當紅軍六年了。六年了！他會有多少故事可說呢！

我很喜歡他。他是一個外貌誠實的青年，很漂亮，身材勻合，在他的紅星下，帶着一捲發光的黑頭髮。在孤獨的山谷裏遇見了他，是壯膽的。真的，我甚至忽略問他關於土匪的事了，因為我們很快地談到紅軍春天裏到山西的東征。爲報答我報告關於這次東征在北平所發生的效果，他告訴我他在這次驚人的抗日東征裏，他所得到的經驗，在這次東征裏，紅軍的基本隊伍，在一個月

之中，增加了幾乎到兩倍。

一三 從安塞到白家坪

兩點鐘後，我們到了安塞，牠位於延水——黃河的一條支流的對面。安塞是很小的，但牠的城牆是很美麗。街道完全被人遺棄了，一切東西都在傾倒的殘餘中。我起先想，以為這些東西里是搶掠蹂躪的結果。但是更仔細一點的觀察，看不見焚燒的痕跡，而且很明顯的，這些類毀的痕跡，都是很陳舊的，而決不會是出於紅黨的手的。姚解釋說：這個城已經被十多年前的一個埋沒全流域的大水，完全摧毀了。

安塞的居民沒有重新建築這個城，他們現在在正面由窰房排列成像蜂房似的一個石頭山里住着，這些窰房離城周圍很近。但是，在我們來到以後，發現了從前駐紮在這裏的一支紅軍隊伍，已經被派遣出去追逐土匪去了，而地方蘇維埃的人員已經到白家坪——附近的一個小村鎮——對省委員做報告去了。姚自告奮勇地要護送我到白家坪去，在傍晚的時候就達到了。我已經在蘇維埃區域裏居住一天半了，可是我沒有看見一點戰時慘痛的現象。我只遇見

一個紅軍兵士，而全體居民，普遍地表示着在極端的安寧裏，從事他們的農業勞作。但是我不會被外觀欺騙的。我記得，在一九三二年中日上海的戰爭期中，中國的農民們，如何地在戰爭的緊急當中，很明顯的毫不關心，去繼續進行耕種他們的田地。所以，當我們圍繞一個轉角，要走進白家坪的時候，我聽見最可怕的最慘酷的號叫的聲音，正對着我，但我也不是沒有準備的。

我決定不現露懼怕的狀態。向着戰場的呼喊的兇猛的聲音望去，我看見了十幾個農民，站在山坡旁邊的馬路上，揮舞着大刀，長槍和一些手槍，態度是非常堅決。好像我這個衝入封鎖者的命運——是不是把我當作一個帝國主義者，交給執行槍決的隊伍，或者是把我當做一個詳實的訪問者，而被歡迎——這一個問題，眼看牠就要解決，不能再耽擱了。

我帶着一種很滑稽的面孔去看看姚，因為他正在大笑起來。「不怕！」他笑出來了。「不要怕！他們只是一些游擊隊——在操練着。這裏有一個紅軍游擊隊學校。不要驚慌！」

後來我知道了游擊隊的日課，包含有這種古代的中國戰爭呼喊的演習，正好像在封建比武的時代，在布克夫人英譯水滸的書中所描寫的那樣。我經驗了某種不知不覺的身體上的脊背上的戰慄，我能夠證明，在桐嚇敵人中，這種呼喊仍舊是很有效力的。在黃暗中，當游擊隊最便

於行動的時候，在突然的攻擊中呼喊著，這些呼喊是十分可怕的。

我剛剛坐下，和一個由姚在白家坪介紹給我的蘇維埃職員開始會談，這時一個帶着印度英軍式的皮帶的軍官，騎了一匹出了汗的馬跑了進來。他很好奇地看着我。從他，我知道了我自己的冒險的整個的詳細情形。

這個新來到的人姓李，他是安塞紅軍保衛團的指揮。他說他正是和一百多人的民團冒險之後回來的一個小農民兒童——一個紅色先鋒隊——跑了好幾里，幾乎完全筋疲力倦地來到了安塞，警告他們，說民團已經侵入蘇區了。又說他們的前鋒真是一個白色土匪——一個外國鬼子——就是指我。

「我馬上帶領了一個聯隊，到山上的小路上。一點鐘後，我們看見了那些土匪。」李重重地述說着。「他們是跟隨着你的。」他指着我說。「只離你兩里路的光景，但是我們把他們包圍了，在山谷裏攻擊他們，俘虜了十八個人，其中有兩個領袖和好幾匹馬。其餘的人逃跑到邊境以外去了。」當他簡短的報告完了，他的幾個部下走進院子裏來，領帶着幾匹被俘虜的馬。

「現在，」他突然地質問，在他詢問的視線裏，知道也問蘇維埃職員姚和我。「這個外國人，

在這裏做什麼呢？他要怎樣呢？」

「我的天！我這樣想着。」他真正以為我是帶領着民團的嗎？白黨如果在無人區把我捕獲了，他們一定會把我當做紅黨看待，難道我從白黨逃出來，僅僅是爲的要被紅黨當我做白黨去俘虜嗎？我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在這一刻很有趣味的一剎那間，一個很漂亮的青年軍官出現了，他帶着很濃的黑鬍鬚。他走近我，用一種很柔和文雅的口氣對我說：「喂！你想找什麼人嗎？」

他說着十分漂亮的英文。

馬上我知道了：他是周恩來——最有名的紅色領袖，爲他的頭顱，×××曾經懸賞過八萬塊錢。到了這裏，我是被他們接待了。

我和周恩來談了幾分鐘後，解釋給他我是誰，他就爲我安排好，在白家坪過夜，而且請我第二天早晨到附近的鄉村他的司令部裏去。

一四 小紅鬼

我坐下來，和駐紮在這裏的交通部的一部份人員，一塊午飯，我遇見了十幾個住在這裏的青年人。他們有些是在游擊隊學校裏的教員，一個是無線電的司機者，有些是紅軍軍官。我們的餐飯有煮的小雞，沒有發酵的蕎麥饅頭、白菜、小米，和我吃的最舒服的馬鈴薯。但是，習慣上除了白開水以外，普通沒有可飲的東西，而開水我是不敢嚐試的，所以我是非常地渴。

食物是由兩個漠不關心的青年小孩子傳遞。他們穿着很長的制服，戴着有尖的紅帽子，長的帽緣，繼續不斷地在他們的眼上敲着。他們起先很無興趣地注視我，可是幾分鐘後，我設法從他們兩人裏的一人，引起了友誼的微笑。我被這種成功鼓勵起來，當他走過我旁邊的時候，我就呼喊他：「喂！」我要求着，「請給我拿點冷水來！」

這個青年人乾脆地不理我。幾分鐘以後，我試驗那另一個，可是沒有較好的結果。

一會兒，我看見了李克農——交通科的領袖——在他的厚鏡子眼鏡的後面譏笑我。他扯了我的衣袖一下。「你可以叫他做一小鬼。」他勸告我，「或者你可以叫他做同志。但是你不能叫他們「喂！」在這裏每一個人都是同志。這些兒童們都是少年先鋒，他們所以在這裏，只是因為他們是來幫助我們的革命軍和義勇者。他們不是奴僕們，他們是將來的紅色戰士。」

那時我原沒有侮辱的意思的，如果我停止了去想一下，我會知道對於少年先鋒隊，「喂」是不適用的稱呼形式的。牠正像英文裏的「嘿」是很不恭敬的。這是一個沒遇過的經驗，我覺得自己像一個沒有思想的蠢人。

這時候涼水真來了。

「謝謝你，同志！」我道歉地說。

這個少年先鋒隊，很勇敢地看着我。「不必客氣，」他說：「你不要爲這樣的一椿事情，謝謝一位同志。」

我自己想這些兒童真是敬人，我在任何的中國兒童們裏，以前曾沒有看見這樣大的自我尊嚴。這種第一次的遭遇，只是少年先鋒隊給予我的一串驚奇的開始。因爲當我更深地穿進蘇維埃區域，我就在這些紅頰的「小紅鬼們」裏，發現鼓舞的，快樂的，有力的和服從的精神——驚人的十年的十字軍的精神——即中國紅軍的活生生的精神。

一五 到司令部去

早晨護送我周恩來的司令部裏去的人，是列寧主義青年團團員中的一個，司令部是一個用竹子防衛着的茅屋，周圍又有許多完全和牠一樣的茅屋圍繞着，在這些屋子裏住着許多農民，他們在戰區裏一點也不驚惶，因為在他們中間，有東方戰綫的紅軍司令官。這就是傳說着的紅軍在農民中的服衆望的祕密嗎？——我這樣地懷疑着——牠能夠像這樣地無阻的推進別的區域嗎？在附近駐紮一些軍隊，鄉村的安寧完全不像曾被驚擾過。

在周恩來——爲他的腦袋×××懸賞八萬塊錢——司令部前，只有一個守衛兵。

我看見屋子裏面是很乾淨的，但是很粗陋地裝飾着的。可看到的唯一的奢侈品，就是挂在土坑上的蚊帳。在坑的腳頭上，立着一對旅行用的鐵箱。一個小的木桌子當做書桌用。當守衛兵報告我來到了的時候，周正濤身伏在桌子上看電報。

「我得到一個報告，說你是一個可靠的新聞記者，對於中國人民是很友愛的，並且說你是很可靠，能自己辨別真理事實，而爲之宣揚。」周說。「這是我們想知道的一切：你是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這對於我們是沒有關係的。我們願意歡迎任何新聞記者來參觀蘇維埃區域，阻禁這件事，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能夠寫一切你所看見的東西，而且你會被給予一切幫助去考查

蘇維埃區域。」

對於這種信賴，允許的誠懇，我是有一點驚奇和有一點懷疑的。我本來想到：即使會被允許在蘇區裏旅行，我會受到某些限制，像關於拍照，採集筆記，召集談話等等，但是他答應得太理想了；在別的某種地方一定會有缺點的……

很明顯地，關於我的「報告」，是從在西安的共產黨的祕密總部來的。紅黨和中國的一切重要城市，包含有上海、漢口、南京和天津，有無線電的交通。雖然他們在「白」區的無線電台屢次的被破獲，但國民黨在長時間破壞和紅區的交通，是永遠沒有成功。據周恩來說：自從他們用從「白」軍奪的器具，第一次建立無線電台以來，國民黨永遠沒有能破壞紅軍的密碼。

「我們幾乎翻譯了一切蔣介石所用的密碼，」他說着。「所以我們能夠翻譯出那送給靠近我們的他的部隊的大部分的信件命令。因為這種緣故，我們也能夠知道：國民黨從來沒有能得到我們的密碼的翻譯方法。他們得到的關於我們的行動的消息，幾乎完全不同而且不正確。」

周的無線電台，在離他的司令部很近的一個地方設立着。經由這個電台他和一切在蘇區

裏的重要地方和一切的前線上連繫。他甚至和總司令朱德有直接交通關係，而朱德的軍隊，那時候駐紮在千餘里外的川藏邊境。在西北蘇維埃的臨時首都保安，有一個無線電學校，在這裏有八十個學生，先前當過電報工程師專家，在那裏受訓練。他們從南京、上海、東京、伯力等選取每日的放送，供給紅色中國報紙以消息和新聞。

周在他的小書桌前面坐着，把他的無線電報放在一旁——這些電報主要地是從沿着黃河、山西的對面，紅軍的東方戰線上駐紮的單位作來的報告。他開始爲我製造一個遊歷的路線。當他製完了以後，他交給我一張紙，寫着包含着九十二日的項目。

「這是我的介紹，」他說，「但是你是不是依照他，是你自己的問題。我想你覺得他是一個有意思的旅行。」

但是九十二天！而且幾乎一半的日子，會被用去專門在路程上。會看見些什麼呢？紅色區域會像那樣地廣大嗎？我沒有說什麼，僅僅關於路線做了一個腦子裏的保留。實際上，我化費了比他所建議的較長的時間，最後因爲我看見的非常少，只懊喪的就離開了。

周允許我用一匹馬，帶我到保安，有三天的路程，而且安排我第二天早晨起程。我可以隨着

交通隊的一部分行走，他們正要回到臨時首都去。我聽說毛澤東和一些別的蘇維埃官員們，這時正在那裏，周並且同意打一個無線電報給他們，告訴他們我的來歷。

一六 叛逆的學者——周恩來

在我們的談話裏，我用很深的興趣研究周，因為在中國和許多別的紅軍領袖一樣，他是一個活潑潑的人，同時也是個故事裏的人物。他有細弱的軀幹，中等的身材，細小的骨格，儘管有長的黑鬍子。在外表上是有孩子氣的。他有大的熱情的深眼。他有着某種吸引力，這種吸引力好像是從羞赧，個性的嫵媚，和命令的堅確的一種奇怪的結晶產生出來的。他的英文有點口吃，但是很正確的，當他告訴我有五年不用她了，我是很驚訝。

我從一個舊同學那裏，知道一點關於周的事情，也從一些國民黨人們知道一點，他們在大革命中和他一塊工作過。——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外國人叫做中國「國民革命」。從周恩來，我會學習更多的東西。爲了一個原因，他特別地引起我的興趣。很明顯地他是中國人物中最稀少的，一個純粹的知識份子，在他行動、學識及信仰，是很好地結合着的。他是一個轉變

成叛逆者的學者。

他是一個官宦的子弟，祖父在滿清朝廷作很高的官，父親是一個很光榮的教師，母親是非常奇特的，（一個實際上喜好近代文學的讀書很多的女子。）周恩來自己好像命裏注定了要做一個大學者的前程，因為從很早兒童時代，他有驚人的文學天才。並且，像他那個時代的許多別人一樣，在民族覺醒的時代中受着教育，他的文學興趣，是改變了。第一次革命以後，當中國的幼稚的文藝復興，萌芽了更重大的生長的時候，周恩來被捲入了到社會革命的運動裏去，這一運動，動搖了中國的魂靈深處。

他在南開中學的英文，得到了一種『自由』的教育。以後到南開大學——一個美國教會在天津主持的事業。他是他們班裏的出色的學生，在南開的三年中，他靠着學校津貼過活。以後就來了日本的二十一條袁世凱的企圖恢復帝制，全中國叛變的開始為民主和社會改革的運動，一九一九年的學生的革命。當一個學生的領袖周恩來在天津被捕了，被監禁了一年。和他同時下獄的別的青年愛國者之中，有一個急進的女學生天津女子師範的學生——這個女人，現在是他的妻子和同志。

釋放以後，周到法國去了。被戰後共產主義所影響，他幫助組織在巴黎的中國共產黨，也變成同時在中國組成的組織的創始人。在巴黎讀了兩年書，在英國讀了幾個月，又回到法國，以後又在德國讀了一年。一九二四年他回到中國，已經是一個很有名的革命組織者了，而且馬上在廣州聯合了孫中山，孫中山這時正和中國共產黨及蘇聯合作，準備國民革命。

在二十六歲，周成了廣州政治生活的領導人物，有名的黃埔軍官學校的秘書長，那時候的黃埔的第一個俄國顧問加倫將軍的親信人。加倫將軍現在是蘇聯遠東紅軍總司令。對於那時候黃埔的校長×××，這位青年共產黨是一個眼中釘，但將被強迫着，不能不任命他做他的『政治顧問』，因為周對於黃埔的急進學生，有巨大的勢力。

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和北伐都進行了，蔣介石任總司令，由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選舉的。周恩來受命令準備一個叛變，幫助國民革命軍奪取上海。一個二十八歲的青年，沒有正式的軍事訓練，很少的關於工人階級的經驗，（因為他是大布爾喬亞家庭的子弟，從大人階級隔離了。）沒有指導書籍，告訴他如何地去鼓動一種暴動，沒有人當他的顧問，重要的俄籍顧問們，都和蔣介石在一塊，周恩來來到上海，僅僅有武裝一個革命的決心，和一種強壯的馬克思主

義的理論。

在三個月裏，共產黨組織了八十萬工人，而且能夠號召一個總的罷工。回答是一致的，對於在中國外國帝國主義這個最大的堡壘的高貴的外國人民，這是一個驚人的經歷。但是這個叛變，沒有能實際化。沒有武裝，沒有被訓練，工人們不知如何地去「奪取城池。」周需要由經驗去學習工人中間一個武裝的核心的需要，而軍人們給他以方便。

過低地估價了第一次和以後的第二次罷工的重要性，舊的軍閥們，只斫了一些頭顱，但是沒有阻止工人運動，沒有明瞭周恩來，沒有禁止共產黨組織五萬工人糾查隊，沒有禁止給他們中間二百人的軍事訓練。沒有禁止他們武裝，和運手槍到城裏，組織了三百人的「鐵隊。」不能這樣，就宣佈了軍閥們的末日。當宣佈了第二次的總罷工的時候，周恩來成功了，領帶着他的二百人，第一先奪取郵政局，其次奪取警察局，以後兵工廠，此後就是勝利。

這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最驚人的政變。

這樣，蔣介石剛巧在後幾天來到上海的四郊，覺得他的戰爭已經是勝利了，而且能夠進城，從勝利的工人軍隊接受權力。也是這樣發生着：當一個月以後，×××開始反革命和屠殺共產

黨查他的罪人的名單上，這個曾經給他以勝利的危險的青年人，是第一名。這樣，周恩來就開始了從國民黨逃亡的生活——他成了第三次革命的領袖，這次革命在中國舉起了紅旗。

周逃到武漢，又逃到南昌，在這裏他幫助組織有名的八一南昌暴動。以後到廈門，這裏紅色工人佔領了中國南部的大海口，在周恩來指導之下，抵抗了外國軍艦和本地軍閥的軍隊雙方的攻擊，支持了十晝。以後到廣州，有著名的廣州公社的組織。

廣州公社的失敗之後，周被強迫着在地下工作——直等到一九三一年，他成功的衝出封鎖，走進江西福建的蘇區。在這裏四年精疲力竭的鬥爭，抵抗中國一切白色軍隊的綜合力量，抵抗外國的飛機炸彈，抵抗毒氣和坦克車，在一種英雄的努力中，亟救這個小的蘇維埃共和國。：重的病和極僥倖的逃脫。：：接着，二萬五千里路的『長征』來到了西北的新的紅色根據地。

這樣的一種堅強的目標，這樣的完全放棄老中國的哲學見解，這種妥協的哲學和愛顧面子，這樣的忍受懲罰和困苦的驚人能力——這種紅軍的故事，是如何地完全非中國的啊！我告訴我自己，周一定是一個瘋癲者，他一定是一個瘋癲者；我找那眼膜的致命的光芒，這是被認為

可以證明瘋癲的種類的。

但是假如是有的話，我是沒有能夠查出來。他說下去，慢慢地，平靜地，有思想地，有智慧地。他關於×××的觀察，由於它的客觀的態度，很少反映他個人必定感覺得到的。對於每個紅黨，都認為負有屠殺這麼多成千的人民責任的人的仇恨。

不，×××不是一個蠢人——周恩來這樣想着。他在許多方面是陰險，狡滑和有才幹的。他是一個有手段的政治家。但是，當做一個指揮野戰的軍事領袖，他是沒有用處的，比起許多他的下級將官們，拙劣地多。蔣自己對於紅軍從沒有打過一個勝仗。周很有意思地笑着。『我們就只希望蔣指揮一切對我們的作戰。這樣戰爭會很快的結束的。但是蔣是不蠢笨的，他知道他的弱點的。他有好的軍事專家，像胡宗南和陳誠，而且他知道如何地去用他們。』

周稱讚總司令對於軍事策略的天才。『在過去十年裏，他從他的外國顧問，大多數是德國法西斯蒂，學習了許多的東西。他學習了而且進步了。在今天，他大概是中國舊式軍閥裏最有能力的戰略家了。』

這很和平地說出來的議論，針對着九年來對於紅色領袖們的毀謗的背景，這些紅色領袖

在國民黨的宣傳中被叫做『狂人』和『無知的土匪』或者別的巧妙的名辭，把這兩方對照起來，是如何地奇特呀。

當周同着我沿着到白家坪的安靜的鄉間道路，經過芝蔴和熟了的麥子田地，和點頭的玉蜀黍，走回家的時候，他好像不適合任何對他常說那些形容詞。完全相反，他好像是真正地爽快，而且和『小紅鬼』一樣的充滿了生命的愛戀，這『小紅鬼』像大人似地在他後面走着，而周恩來伸出一隻父親似的手，圍繞他的肩膀。他十分像那種在南開學校遊戲中，吸引女性們的青年——因為在那些日子裏，周是非常漂亮，而且有一條像女子的苗條的身軀。

『那不會是種奇蹟嗎？』這位叛逆者，在他的天真的熱情的突然爆發中說了，『當我們有像他這樣的五千萬少年先鋒隊，佈滿全中國組織起來了的時候！有一日，我們總會成功的！』

雖然我是久經世故和多疑的，在那一刻時候，我是相信他的。究竟和佔領上海比較起來，牠好像是件小事件。

一七 幽默的戰士

第二天早晨六點鐘，我同一隊大約有四十個青年的交通隊，一同出發。他們是護送一隊貨物的駱駝隊，到保安去。

我發覺出來，只有我和傅金魁——紅黨們自己的外交部的使節，和李祥林——一個紅軍軍官，三個人騎着馬。可是也不能以辭害意：因為傅雖然可以坐在一個強壯的騾子上，但這騾子早已馱載過重了；李祥林也坐在一個同樣負載過重的騾子上面；我是漫然地跨在孤獨的馬上，這馬，我有時候不能夠十分確定，是不是還在我的跨下。

我的牲口，有一個彎彎的脊背，和一種駱駝的脚步。他的可憐的瘦弱的腳，很危險地蹣跚着，我每一分鐘，都等待着牠的摔倒，嚙了牠最後一口氣。當我們沿着窄小的道路爬的時候，牠是特別地困苦。這條窄的小路，是由我們沿着走的河床那裏高起的山崖斫成的。我好像覺得馱着我的重量，祇要任何一個突然的變動，會把我們一同扔到下面的石頭的山谷裏去似的。

李祥林坐在他的行李堆成的金字塔上，嘲笑我的困難和不安。『你坐的是一付好鞍子，同志，但是在鞍子下面的馬怎樣了？』

我的地位是不應該抱怨的，因為到底我算誰呢？我應該騎馬嗎？但是聽見了他的談諧話，我

禁不住批評一句：「李祥林，告訴我這件事吧，像在這樣狗一般的馬上，你們如何能夠驅逐白匪呢？你們所騎的難道就是我所常聽見的不會打敗仗的紅色騎兵用的馬嗎？」

「不——不！不！你會明白的！你的馬壞啦，那就真沒有用了嗎？正是因為在後方，我們有像這樣的壞馬，所以在前線，我們的騎兵隊是不會被打敗的。我們在後方只是用騎壞了的馬。對於一切的東西：槍、糧食、衣服、馬匹、騾子、駱駝、羊，都是這樣的——好東西都給我們的紅色戰士。同志，如果你想要一匹馬，到前線去吧！」

我很快的便決心依從他的勸告。真的，如果在膝下沒有一匹好的光滑的牲口，能夠嚐到「土匪」存在的快樂嗎？

「但是，李祥林，怎麼你自己沒有在前綫呢？難道你也壞啦嗎？」

「我壞啦！決不會！但是你可以知道，在前綫捨棄一個好人比捨棄一匹好馬容易些。這就是剛才所說的話的意思。同志！」

李指揮真正是一個好人，一個好布爾什維克，一個會說故事的人。他已經做了十年的紅黨了，是一九二七年有名的南昌暴動的元老，那時候被逼到「不是戰爭就是消滅」的關頭的共

產黨，開始在中國成爲一個獨立的力量。當我在李指揮旁邊騎着，走着，氣喘着，口乾着，上下陝西破斷的山路的時候，他一個又一個地，重述着發生的事件和典故，而且有時候，當被一再地催促着的時候，甚至彎着腰談論他自己。

他仍然還是一個青年人，大約三十一二歲。但當他慢慢地展開他自己的故事時，你便知道他已經出死入生地十幾次了。我想生命對於他，除了是一種對於死的挑戰外，是沒有別的意思的。而在他身上，我開始發現一種特殊的性格，這種特殊的性格，在這個奇怪的中國革命者們的鐵的友誼結合中，我會不斷地遇見過。某種東西，使着每個人的受罪成功，成爲大家集體的負擔和快樂；某種力量，把個人推翻了，消失了個人，使他們真正地忘掉他們自己本身，然而在自由和力量的尊貴之中，以及彼此共同吃苦耐勞之中，多少地表現他們自身。

且說，這樁事情，是使人不相信的，假如你認識中國！但是它是一樁事實！將來我試要解釋它爲什麼。

李祥林是一個湖南人，在大革命開始的時候，他是一個中學生。他參加了國民黨，投入了黨的學校。在一九二五年，連同一個宣傳隊，被學校送去作一件責任重大的工作。他們的職務是去

拜訪土匪首領賀龍——現在在國民黨報紙上被稱做「罪惡昭彰」的賀龍，但每一個紅軍兵士都承認他現在是一個光明奇特的英雄。李祥林和他的宣傳隊，被派做代表去游說賀龍來順從國民革命的使命。

「即使在那時候，賀龍的手下也不是土匪，」當我們那天在一個小河旁的樹下休息的時候，李告訴我：「賀的父親，是哥老會的一個首領。賀龍承襲了他父親的威勢，所以當他青年時候，就名聲遍蓋湖南了。湖南人傳說了許多關於他的青年勇敢的故事。」

「當我們走去見他的時候，他已經被編為省軍。他管轄一個區域，那裏正是從雲南到漢口的鴉片烟運輸隊必經之路，他恃着徵收鴉片烟稅為生，而不搶掠剝削人民。他的部下，不好淫也不飲賭，不像別的土匪和大部分的省軍一樣，他更不准兵士們吸食鴉片。」

「我們的宣傳隊，向賀龍談了三個星期。他那時是不識字的，但不是個無知無識的人。他很快地明白了革命的意義。但他很小心地考慮，和他的軍隊商量，最後他同意參加國民黨。他被命為國民革命軍的指揮，當革命到了湖南的時候，他便自己和革命聯合了。」

李說他和賀龍直等到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以後，才變成共產黨。在這個時候，湖南的腐敗的

軍閥××和×××勾結了，並且開始了他的無恥的『屠殺農民。』

賀龍原在何健指揮之下，但是當屠殺繼續下去，這把他幾乎逼瘋了。他自身是從低級的農家出身，他是同情於窮人們的，他不能明白爲何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能開始屠殺成千累萬沒有武裝的男女，而他們的罪名不過是作過國民黨自己組織起來的農會的會員。於是他變成紅黨了。

『××是一切反革命軍閥們中的最殘忍最野蠻的，』李說，『我不知道他一共殺了多少人！一定有好幾十萬了。我只知道：在我自己的區域——湖南瀏陽縣，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到六月之間，他殺了二萬以上的農民，我那時在那裏，所以我知道。』

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如何地逃跑的，所以我問他，他拉開他的藍棉襖——在棉襖之下他沒有穿別的東西——指着一條很長的有齒的疤痕，從筋骨到腰部。『你看，我沒有能完全逃脫呢，』他笑了。

一八 老狗·老表·鐵老虎等等

我們決定到河裏去洗澡。我們投進水裏，臥在一塊長的平的石頭上面，淺的水在我們身上蕩起冷的皺紋。一些農夫在我們身邊走過，在他們前面趕着一大羣羊；在頭上的天，清朗蒼翠。在這裏除了和平和美麗以外，沒有別的東西，正在這神祕中午的時候，這世界好像幾世紀都像這樣，只有和平與美麗。

有幾個『小鬼』爬向前來，扔了一塊大石頭到我們後面，濺了許多水到我們頭上。他們自己很高興馬上跑開了，李望着他們背後笑了。

『我的孩子如果留到現在，會要有他們這麼大了。』他突然提起來。『但是他和我妻子被××殺死了。』

我漸漸明白了一點爲什麼中國紅黨戰爭了這樣長久，這樣地不妥協，這樣不和中國人一樣的。當我更前走了幾十里，我從一些別的紅色伴侶那裏，知道了更多這些事。

第一天以後，我騎在馬上的時候很少，不是因爲可憐這匹老馬，而是因爲別人都是走路。李祥林是這一隊人裏面的最老的戰士，大分別的人，都是十幾歲的兒童。他們之中有一個綽號叫做『老狗』的，我和他一齊走，問他爲什麼參加了紅黨。

他是一個南方人，從中國南部福建蘇維埃區域，隨着紅軍的長征，一直來到西北——這個二萬五千里的長征，是外國軍事專家，不會相信牠的可能的。但是這裏就是老狗，年紀十七歲，但看來只像十四歲，他完成了這個長征，而不把它當做一回事。他說：假如紅軍需要的話，他準備再走二萬五千里。

和他一塊的，有個綽號叫做「老表」的，他是十六歲。

我問過他們喜歡紅軍嗎？他們帶着真摯的驚奇看着我。很顯明地，他們任何一人，從來沒有想到過，會有人不喜歡紅軍的。

「紅軍教給我讀書寫字了。」老狗說了。「在這裏我學會了運用無線電了，也知道如何能準確地射擊。紅軍幫助窮人們。」

「就只這些嗎？」

「牠對於我們是很好的，而我們永遠沒有挨打。」老表接着說了。「在這裏一切的人都是平等的。不像在白區裏，在那裏窮人是地主和××黨的奴隸。在這裏，一切都為幫助窮人而戰爭，為拯救中國而戰爭，紅軍和地主與白匪戰爭，紅軍是抗日的。現在，請告訴我，為什麼有人不喜

歡像這樣的一種軍隊？」

有一個農夫的小孩，他在四川參加了紅軍，我問他爲什麼要參加的。他告訴我，他的父母是窮的農夫，只有四畝地，不能夠養活他和他的兩個妹妹。當紅黨來到他們的鄉村的時候，一切的農夫都歡迎他們，爲他們泡茶和做點心。紅色的戲曲家爲他們表演戲劇。這是一個快樂的時候，只有地主逃跑了，當土地被重新分配的時候，他的父母，得到了他們的一份。所以當他參加了窮人們的軍隊的時候，他們不但不發愁，並且很快活。

另外一個青年人，大約十九歲，從前是湖南的一位鐵匠的徒弟，綽號叫做『鐵老虎』。紅軍到了他們縣裏，他扔了風箱火爐和徒弟的職務，僅僅只穿上一雙草鞋和褲子，急忙跑開投入紅軍了。爲什麼呢？因爲他想和令他們饑餓的師傅們打仗，想和搶去了他們父母的土地的地主們打仗。他是爲解放窮人們的革命而戰爭。紅軍對於人民是很好的，他不像白軍們搶他們，打他們。他扯起來他的褲腳，很驕傲地擺露出來一條長的白疤痕——他的戰爭的紀念品。

還有一個從福建來的青年人，一個從浙江來的，幾個從江西四川來的，可是大多數是陝西甘肅的本地人。有些已經從少年先鋒隊畢業，雖然他們外表像小孩，可是已經當了好幾年紅黨

了，有些參加是爲了去和日本作戰，兩個參加是爲的要脫逃奴役，三個是拋棄了國民黨軍隊，但他們的大多數參加是「因爲紅軍是一個革命的軍隊，和地主帝國主義戰爭的。」

以後，我就和一個聯隊的指揮官談話，他是一個「老一點」的人，年紀二十四歲。他從一九三一年起就在紅軍裏。在那一年，他的父親和母親都被南京轟炸機炸死了，並且把他在江西的家燬滅了。當他從田地裏回到家裏的時候，看見了他的父母都死了，他馬上扔下他的耒頭，和他妻子告別，投入了共產黨。他的一個兄弟，是個紅色游擊隊，一九三五年在江西被殺死了。

他們是很混雜的一羣，但比起普通按省份區分着的中國軍隊，在組織上更具有真實的「民族性」。他們的不同省份的背景和方言，沒有把他們區分開，並且常常變成了很要好的夥伴。在他們之中，我從來沒有看見一件很嚴重的口角。實在，我在蘇區整個的旅行裏，沒有看見一件紅軍兵士之間的交手打架。我認爲這件事在血氣方剛的青年之中，是很難能的。

雖然悲劇幾乎接觸了他們全體的生活，但是也許是他們太年青了吧，悲劇並沒有使他們沮喪。在我看來，他們好像是真正快樂，而且或者是我第一次看見的中國普羅列塔利亞從心裏快樂的一羣。消極的自滿，是在中國的普遍現象，但對於生存的積極感覺的高一層的快乐情緒，

實在是稀少的。

他們在路上整天的唱，而他們關於歌的來源是無止境的。他們的歌唱並不是由於命令，都是自動的。他們唱的很好，完全是由心坎流出的。每當靈感激動了他的時候，或者他想到了一個適合的歌，他們裏的一個人，會突然的爆發出來，而指揮官和士兵都聯接起來。他們在夜晚也唱，從農民學習了許多新的民間的調子，這些農民帶來了他們陝西的胡琴。

他們所有的紀律，幾乎完全都是自己訂立的。當我們走經一些在山上的長的野杏樹的時候，猝然人都分散了，直等到每人都裝滿了他的口袋，而且總有人帶回一手捧給我。於是，離開這些樹。他們恢復了秩序，就很快地前進，追補剛才耽誤了的時間。但是當我們走經私人的果園的時候，沒有人動在裏面的果子，而我們在鄉村裏消費的五穀蔬菜，都是十足給錢的。

盡我所能觀察到的，農民們對我這些紅色戰士，沒有仇恨。相反的，他們好像彼此有很親密的友誼，而且是很忠誠——這種事實，或者不是與最近的重分土地無關的。他知道所有可吃的東西，都很自由地拿出來賣，而且毫不躊躇地接受蘇維埃貨幣。當我們在正午或日落的時候來到一個鄉村，本地的蘇維埃主席，很快地會為我們準備地方，指定爐火給我們用。我屢次看見農

夫家女人和他們女兒，自願地拉扯我們的火爐的風箱，和紅色戰士們吵笑談諧——這對於中國婦女是極解放了。特別是陝西的婦女。

最後一天，我們在一个綠色山谷之中。一個鄉村裏停下吃午飯的時候，那裏的一切的我們，都來了圍着觀察他們平生第一次看見「外國鬼子。」我決定要盤問他們。

「什麼是一個共產黨？」我問。

「他是一個幫助紅軍攻擊白匪和日本的公民。」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子說了。

「還有什麼？」

「他幫助攻擊地主和資本家！」

「可是，什麼是資本家呢？」這句話把那個小孩子問的說不出來了，但是另一小孩子走向前來：「一個資本家，是一個自己不作工，但是使着別人替他做工的人。」這或者是太簡單了，但我繼續問下去：

「在這裏還有些資本家和地主嗎？」

「沒有！他們大家一齊喊：『他們都逃跑了。』」

「逃跑了？爲什麼逃跑的？」

「躲開我們的紅軍逃跑的！」

「我們的」紅軍，一個農民兒童談論他的紅軍？那麼，很明顯地這不是中國，但是，如果不是的話，那是什麼呢？我決定了，這是不可說的，誰能夠教他們所有這些事情？

以後，當我考察紅色中國的教科書的時候，當我遇見聖誕老人徐特立——從前長沙師範的校長，現在蘇維埃教育委員——的時候，我會要發現他是誰的。

真的，我在這天的下午，當我們的小駱駝隊下了最後的山坡，踏進保安——中國人民蘇維埃共和國臨時首都的時候，就會要見他的。

一九 紅軍大學及其校長林彪

關於在陝西保安的紅軍大學，是有許多事情，非常奇特的。

牠的校長，是一個年紀二十八歲，從來沒有打過一次敗仗的軍隊指揮官。在紅軍大學中有一件很可自豪的事，就是在一班研究生裏，老練的戰士們，平均的年齡是二十七歲，每個人平均，

都有八年的作戰經驗，和三處傷痕。每人平均都走過一萬英里的長征。除了紅軍大學之外，世界上能有一個因為紙的缺乏，以致祇有用敵人宣傳品的空白或背面，做課室的筆記本的學校麼？教育每一個學生的費用，包括着衣食和一切雜費，每月用不到十五元的學校有嗎？能有這樣的一個學校，爲在那裏的幾個著名學生的首級，懸賞價值的總數超過二百萬元的嗎？

這樣就是所謂紅軍大學。

最後，紅軍大學，大概要算世界上唯一的最高學府——教室都是一些土洞，椅子和桌子都是石頭和磚的，黑板都是些石灰和土的牆，建築都完全是預防空中轟炸的。

這件事也是因爲，在陝西和甘肅，除了普通房子以外，有些大的窖洞式的住宅，窖洞式的廟宇，和幾百年古舊的堡壘牆穴。在一千年以前，富足的官吏和地主們，建築了這些奇怪的建築，去防備水災，強盜和飢饉，並且在這裏堆集糧食和財寶。

許多圓頂的房子，很深地挖入黃土和堅固的石頭之中，有許多屋子能容幾百人。這些山崖的住宅，今天做成了很好防空的掩蔽部，預防着南京新的漂亮的飛機；這些飛機，是中國人民送蔣介石去和日本作戰的。在這樣的古代的住宅裏面，紅軍大學安置了奇怪的但是安全的設備。

在我到達不久，蒙介紹得見紅軍大學校長林彪先生。並且有一天，被邀請對他的學生講演。他提出『英美對華的政策』這個題目，我猶疑着。對於雙方，我知道的都太少。此外，我不能用很好的馬克斯主義的名詞來解釋。但林先生堅持着。他說他們自己可以供給馬克斯主義的名詞。當時他爲這盛會安排了一頓麵食，這對我太過分了，所以我接受了他的要求。

林彪生於一九〇八年，是湖北省一家廠主的兒子。他的父親是被苛捐雜稅摧毀了，但林先生掙扎着讀完了初級學校，而變成廣州黃埔軍官學校的學生。在這裏他有了驚人的成績。他在蔣介石之下，和蔣介石的主要顧問俄國加倫將軍——現在蘇聯遠東紅軍司令的之下，受了深刻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訓練。畢業不久，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了，林彪被提升到陸軍上尉的職位。到一九二七年，當他二十歲的時候，他是有名的國民黨第四軍的上校。在那年的八月，南京右派政變之後，他率領了他那一團人，和賀龍葉挺領導之下的第二十軍聯合，在南昌暴動，開始了共產黨在中國的反抗。

林彪和毛澤東享有同樣的聲名，是幾個從未受過傷的紅軍指揮官的一個，在前綫上參加了一百多次戰爭，指揮作戰在十年以上，經受了士兵所知道的一切艱難。爲了他的首級南京曾

懸賞了十萬元，他很神祕地沒有受傷，很健康的活到今日。

在一九三二年，林彪被委派為紅軍第一軍的總指揮，那時候有兩萬枝槍。他成了紅軍最可怕的一部。主要地是由於他奇特的軍事天才，他打敗了，摧毀了，解除武裝或驅逐了一切派去圍剿他的政府軍。但是，關於有名的紅軍第一軍，以後當我到了前線的時候，再詳細地說吧！

和許多的有能力的紅軍指揮官一樣，林彪永遠沒有到過外國，除了中文以外，他不能說任何語言。然而，不到三十歲的年齡，他已經爭取了紅區以外的讚許。他在中國共黨軍事雜誌鬥爭和戰爭與革命上面的文章，在南京的軍事雜誌上，曾被研究與批評過，也受過日本和蘇聯的研究與批評。他被稱讚做突擊戰術的發明者。這種戰術，馮玉祥曾經很精密地註解過。紅軍第一軍的許多的勝利，據說可以歸根到紅黨的這種突擊戰術的巧妙運用。

二〇 紅軍大學的學生活動

一天早晨，我和林彪以及他的教職員們，一同出行，走到保安城外不遠的紅軍大學去。我們在下課的時候來到那裏。許多學生，在兩個設備很好的場子上打籃球；還有一些學生，在黃河支

流旁邊的泥土地安置好了的場子上打網球。這條黃河支流圍繞着保安邊界。紅軍大學的講師吳良平，在閒暇的時候又是網球教員，以二對六的比例下，打敗了我，顯露了他的威力。還有一些學生在打乒乓球，寫字，看閱新書和雜誌，或者在他們的簡陋的俱樂部中讀書。

這是大學的第一部，有二百多學生。這大學在蘇區普通都稱做紅大，共有四部，八百以上的學生。在教育委員會管理之下，在保安附近，還有無線電報，騎兵隊，農業的和醫學的訓練學校，有一個共產黨訓練學校，和民衆教育的訓練中心。

聚集了二百多學生，來聽我講解「英美政策。」我做了一個英美態度的粗略的總結，並且同意回答他們的問題。我很快就知道了，這是大大地錯了。這頓麵食很難償還我所受的苦惱。對我下的問題，雖有韋爾斯的聰明和天才也難應付，舉例說吧，你會如此地答覆下面對我發的問題嗎？

「英國政府對於親日的冀察政務委員會的組成，和華北日軍的駐防，持如何的態度？」

「美國的復興方案的實在的結果如何？他對於工人階級的利益如何？」

「假如日本和中國的戰爭起來了，德國和意大利會幫助日本嗎？」

「假如別的列強，不幫助日本的話，你以為日本對中國的戰爭，能繼續多久呢？」

「國際聯盟，爲什麼緣故失敗了？」

「爲什麼在英美兩國，共產黨是合法的，而兩國都沒有工人的政府？」

「在英國反法西斯陣線的形成，有了些什麼成就？在美的情形又怎樣？」

「在巴黎國際學生運動中心的前途如何？」

「在你的意見看來，李滋·羅斯訪日，是否會產生一個對中國的英日協定政策？」

「當中國開始反抗日本的時候，英國和美國，是幫助中國？還是幫助日本呢？」

「請告訴我們，如果英國和美國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爲什麼英國和美國，在中國保有他們的軍艦和武裝？」

「美國和英國工人們，對於蘇聯的觀感如何？」

你會要承認，在兩點鐘發問的時間裏所包括的範圍是不小的！而事實上，這並不限在兩小時裏，從早晨十點鐘，一直延長到下午很晚。在結局，證明了是不能得到結論，而且擾亂了當天的工作。

以後，我參觀了各種課室，和林彪及其他職員們說話。他們告訴我一些關於他們的學校的投考的情形，給我看他們印就的課程一覽表，已經有了好幾千份秘密地分散到全國各地。大學的四部，不分階級以及社會政治上的不同，凡一切決心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戰，願為民族解放的目的而貢獻自己的，他們都歡迎。年齡的限制是十六歲到二十八歲，性別不論。『投考的人必須要身體強壯，沒有流行病，』而且也『沒有任何的惡習。』

我發覺了，實際上，大學第一部的大多數的學生，是營、旅、或師的指揮官，或者是紅軍的政治委員，領受高級的軍事的和政治的訓練。在這裏教授的課程，須要四個月之久。依照紅軍的規則，每個指揮官或政治委員，在每兩年的活動職務裏，最低限度，必須在這個時期，在紅軍大學，消費四個月。

第二和第三部，包含中隊、連、和營的指揮官。有紅軍裏有經驗的戰士，和從『中學或同等學力學校畢業，選擇出來的新入伍人，沒有職業的教師和官吏，反日義勇軍學生，反日游擊隊領袖，和從事組織工人和領導工人運動的工作人員。』在紅軍對山西省的進征中，有六十個以上的山西的中學畢業生，參加紅軍了。

第二和第三部的課程，須要六個月之久。第四部主要地是專門訓練工程師、騎兵、步兵和砲兵隊。在這裏，我以後會要遇見一些以前的機器師和學徒們。當我要離開紅色中國的時候，我遇見八個預備投考紅軍大學的學生，從上海北平來的。他們告訴我：從中國全部，他們有一個二千人以上的學生投考者的候補名單。那時候最大的問題，是入境的問題，因為每一個學生，都是秘密地進來的。

紅大各個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課目。但第一部學生的食物單，可以拿來當做樣單。政治講話包括有這樣科目：政治知識，中國革命問題，政治經濟，黨的建設，民運策略問題，列寧主義與民主的歷史基礎，日本的政治經濟力量。軍事科目包括有：對日戰爭的戰術問題，對日的游擊戰術，反日戰爭中之游擊隊戰爭的發展，日本對華作戰中之問題。

其中的一些科目，預備了特別的教本。有些是從在江西的蘇維埃印刷所全部運來的，他們告訴我：在這個印刷局的主要工廠，有八百以上的印刷工人被雇用着。別的科目所用的材料，是紅軍指揮官及黨的領袖們關於俄國及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的演講。

這些科目，或者是對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問題——紅黨們真心地想和日本作

戰嗎？——的一個回答。更進一步的證明，是在毛澤東對我解答解放戰爭中的所必須採用的主要的戰略的單刀直入的答案中，因為他的解釋——他也在紅軍大學裏講課——是根據對中國的很深認識，所以是值得簡單地引用的。

二二 解放戰爭中的戰術

毛澤東以爲中國對日作戰的戰略，必定是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線上作戰！這種戰略，全靠在艱險的戰場上，高速度行軍的成功，進退的迅速及集散的敏捷。其次，這戰爭是要大規模的游擊戰，而不是深溝壁壘，層層防線，專恃堅固防禦工事的陣地戰。

從地理上說來，戰場這樣的廣大，我們作最有效的游擊戰爭是可能的，並且日本遇到猛烈的後方活動，必得謹慎，她的戰爭籌備，行動很慢，效率有限。深溝高壘，集中火力，在一個狹小戰線上爲一兩個重要地點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們徒然失掉了在地理上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了阿比西尼亞的錯誤，在戰爭的前期，我們的戰術和戰略必要避免一切大的決戰，要漸次破壞敵人主力的精神，戰鬥力的和軍事效率。

阿比西尼亞的錯誤，並非是他們內部政治的弱點，而是因為他們要保持密集隊形，叫法西斯來轟炸，放毒瓦斯，用精良器械來攻擊，致使他們密集的重兵，行動不靈，受了致命的傷害。

我們除了調動有訓練的正式軍隊之外，在農民之中，要政治的軍事的武裝大多數的游擊隊，在東北抗日義勇軍所完成的工作，僅僅是表示了全中國革命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實力的一小部分，如果指揮組織得當，這種游擊隊能使日本人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疲於奔命。

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本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民包圍，日本軍要被逼得運來他們一切的軍需品，而且要自己來看守，並需用重兵來保護所有的交通線，另外還有一大部人去駐紮滿洲同日本內地……這樣，在侵佔中國長期消費的壓迫下，日本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不能決定戰爭大局的折磨中，日本軍隊的士氣將行瓦解，中國抗戰的潛伏力量一天一天的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衆不斷的傾注到前線去，準備爲自由而戰爭，但日本帝國主義却因中國的抵抗而日趨崩潰。

我聽到這些豪壯的話以後，繼續問毛先生日本會發生些什麼呢？

「日本的革命，不僅是一種可能，而且是種必然。」他這樣地回答。「這是不可避免的，在日

本軍隊遭受了第一次重大失敗以後，革命會立即爆發的。」

這次談話，還有很多事情，是關於高深的軍事的和技術的問題。僅就所說的這點已經足夠指明：紅黨對中國抗日的民族獨立戰爭是如何地看法，以及如何地極積地計劃——這個戰爭，他們認為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由於某種奇蹟，日本從中國的廣大領土上撤退了。

前途不是樂觀的。一些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家，認為這是一個發狂的預測。但是別的一些人，坦白地說，他們並不責備中國人民——他們好幾千萬已成了日本所征服的人民了——假如他們現在寧為玉碎，而不再不鬥爭地退讓任何一點自由。

至少，紅軍現在是完全地決心要戰爭，而且他們相信，戰爭的開始，他們會站立在最前線上。這些不僅表現在軍隊中的嚴刻的實際訓練，而且你也能在普遍蘇區中的深刻宣傳中看得出來。

在這種教育使命中佔着領導地位的，是許多的青年隊伍，名叫抗日劇社，他們不停止地來回在蘇區裏巡行着，散佈着抗敵的福音，喚醒在農民階級中酣睡着的民族意識。

我現在要介紹給讀者，這個驚人的兒童劇社的一次公演。

二二 走向抗日劇社去

當我同一個邀請我到抗日劇社去的青年軍官一同出發的時候，人們已經向着由一所舊廟臨時搭成的露天戲台移動了。那天是星期六，日落前的兩三點鐘，整個保安好像是在走向那裏去。

紅校的學生們，驢夫們，軍衣工廠和鞋工廠的女工們，合作社和紅色郵務局的書記們，士兵們，木匠們，鄉人和他們的小孩們——都開始向着河邊的大草原上流去，在那裏演戲劇者正在表演。這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民主化的聚會，甚至於一些羊，都在距離不遠的網球場上吃草。

那裏不賣票，也沒有什麼優先座位。我看見中央委員會書記洛甫，財政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一些別的官吏們以及他們的妻子們，在羣衆中散佈着，和別人一樣地坐在有彈性的草捆上。演劇開始以後，大家對他們都很少注意。

橫掛在台前的是一塊大粉紅綢幕，上面寫着中國人民抗日紅色劇社，是漢字，同時也有拉丁化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紅黨們正採用着來加速民衆教育。演劇程序，定三小時演完。裏面有

戲曲、跳舞、歌唱和一種中國劇。這劇是一種綠色的表演，或者是鸚鵡，主要的是表現兩個中心題目——反日和革命。它充滿了明顯的宣傳，完全率直的，而它的情調是原始的。但它有着從銅鈸敲打和假聲歌唱解放出來了的優點，而且是和活的材料有關係，不是一些沒有意思的歷史設計，如同沒落的中國歌劇一樣。

最後，它在機巧和精緻中所缺乏的東西，由它的強壯的生活力，和它的感人的幽默，以及一種演者和觀者之間的交流，一部分地被補充起來了。在紅色劇社的客人，好像真地細「聽」台上所說的話。這和中國其他酣歌醉舞的觀衆對比起來，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因為在中國聽戲的人們，主要的時間是消耗在吃菓子和瓜子，談話，來回地拋熱手巾，從這一個包廂去拜訪另外一個包廂的人，而只偶爾地看到台上去。

這裏的第一齣戲，叫做「侵略」。開幕的時候，是一九三一年在滿洲的一個鄉村的場面。日本人來到了，把不抵抗的中國軍隊驅逐去了。第三幕是日本軍官們在一個農民家裏宴會，用中國人當椅子，喝醉了酒去調戲他們的妻女。再有一幕是表演日本販賣嗎啡和白面的毒犯，強迫每一個農民買一定的分量。有一個拒絕買的青年被帶走去受詢問去了。

「你不肯買嗎啡，你不遵守滿洲國的衛生法律，你不愛戴你的聖主溥儀，」他像魔王一般地責備他。「你不是好人，你是一個反日的土匪！」而這個青年，很快地被處死了。

又一幕是鄉村的市上，小商人很平安地販賣他們的貨物。突然日本兵來了，搜尋「反日土匪」。馬上他們盤問護照，那些忘記帶着的人們，都被槍殺了。以後兩個日本兵大吃豬肉販子的肉。當他和他們要錢的時候，他們很驚訝的望着他。「你要錢嗎？這可怪了！蔣介石把滿洲、熱河、察哈爾給我們，塘沽停戰協定，何梅協定，冀察政務委員會，給我們，沒有向我們要過一個銅板！而你爲一點肉，便向我們要錢麼！」這樣，他們就把他當做「土匪」用木椿釘死了！

最後一幕，自然，這些事情對於鄉村裏的人們是夠受的了。商人們推翻了他們的攤子和布棚，農人們帶了他們的槍刀衝了出來。婦人和小孩們拿着他們的刀子，一切人們都發誓和「日本鬼」作殊死戰！

這個短劇充滿了幽默和一些土語，與討厭及仇恨的罵街互相輪流着，引起觀衆的哄堂大笑。聽衆是很受刺激了。這對於他們不僅是政治的宣傳，也不僅是激動感情的戲曲，而且切合真理。事實上，演劇者大多數祇是一些十幾歲的青年，山西和陝西的都有，但是劇情的深刻，觀衆在

心領神悟之中，好像忘却他們是小孩子。

這種慘痛的劇情——用一種笑劇形式表演出來，可是它的真意是智巧和幽默，不能隱瞞的，至少對於一個青年兵士是如此的。在完場的時候，一個兵士站立起來，用一種被感情震動起來的聲音呼喊道：『打倒日本強盜！』『打倒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打回老家去！』整個人羣很有力地回響他的口號。我後來知道這個兵士是東北人，他的父母雙親是被日本殺死了。秩序單上的第二項是『收穫舞』，由戲劇社十二位女演員表演的，赤着腳，穿着農民的褲子、大褂，和相似的背心，頭上包着綢手巾。她們用整齊的步調，很莊嚴的跳着。我知道這些女孩子裏有兩個，完全步行由江西走來的。她們在瑞金紅色戲劇學校學習了跳舞，她們是很聰明而有天才。

再一項奇特而有興味的是『聯合戰線舞』，牠的意義是解釋中國抗日的總動員。但他們用的什麼幻術，製造成他們的衣服，我是不知道的，只知道突然一羣青年穿着水手的短衣服；先是當做騎兵隊登場的，以後又當做空軍隊，接着當做步兵，而最後當做海軍，他們的姿態和手式，以中國人天生的藝術天才，很真實地表演出來。

還有一種叫做『紅色機械舞』用聲音和手勢，四肢和頭的交叉，來表示。小的跳舞家們摹做着活塞，摹做着大小輪子的旋轉，發電廠的聲音——象徵着中國將來的機械時代。

在休息的時間，從聽衆之中起來了民衆的歌唱。有五六個本地的陝西女孩們——在工廠裏的工人——被大家所邀請，唱一個古的本省的民歌，有一個陝西的農夫，彈着他自己做的琵琶配合着。一個紅校學生拉着胡琴，並表演一種手提琴。另一個又被請求唱一首南方流行的歌。忽然，使我完全舉止失措，一種要求外國新聞記者的獨唱開始了！

他們不肯饒恕我。可憐的很，我除了狐步舞，爵士舞，波希姆舞，和國歌以外，什麼都不知道。而這些好像在這裏都不適合似的。我甚至連『馬賽曲』都忘掉了。他們堅持着他們的請求。在極端困窘之中，最後我唱了『飛行木棒上的人』。幸而他們都非常客氣的，使我下了臺。

我看見下一幕展開了，才覺得放心。這是一個以革命爲題材的社會劇——一個會計師和他的地主的妻子陷入愛情了。接着又有一些跳舞，有關於最近從西南來的消息的『活報』。有兒童們『國際歌』的合唱。在這裏圍繞着一個光明的圓柱掛一串萬國旗，年青的舞者圍繞着牠傾斜着身子。他們隨着字句慢慢地起來，而當唱到結尾的時候，都站起來，高舉攢着的拳頭。

戲已經是完了，但我的好奇心還存有着，所以第二天，我去見危拱乞女士——人民抗日紅色劇社的監督。

危女士二十九年於河南，已經做了十年的紅黨。她以先是參加「基督將軍」馮玉祥的國民軍宣傳部，但當馮和南京在一九二七年妥協以後，她和一些別的青年學生脫離開，參加漢口的共產黨。一九二九年，她被共產黨派到歐洲，在法國讀書，以後又到莫斯科。一年後她回到中國，很順利地穿過了國民黨對紅色中國重圍的封鎖，而到瑞金開始工作。

她告訴我一些關於抗日劇社的歷史。戲劇組好像是五年之前開始在江西組織的。依照危女士的話，在那裏，瑞金的高爾基學校，有一千以上從蘇區招集去的學生。紅黨訓練了六十組的戲劇隊。他們旅行遍了前線和各鄉村。每一隊都從鄉蘇維埃接到許多預定單。農民們對於在他們的文化飢餓的生活裏的任何娛樂，永遠是非常感激的。爲了這種貴客，總是自動地爲他們安排一切運輸，食物和住的地方的。

在南方的時候，危女士是助理指導員，但在西北，她已經負責戲劇組織的全部了。自然她也參加了從江西出發的長征，是數十個經歷了這次長征的蘇維埃婦女中的一個，在南方的隊伍

來到以前，在蘇維埃陝西早創立了一些戲劇隊，但從江西來了新的分子以後，顯然地戲劇的藝術，得到了新的生命。危女士告訴我，這樣的遊行戲劇隊，現在已經有了三十隊以上，在甘肅還有些別的。以後在我的旅行裏，曾遇見很多。

「每一個軍隊有它自己的戲劇組，」危女士接着說，「幾乎每一個區域都是同樣。演員幾乎都是本地召集的。我們從南方來的有經驗的演員的大多數，現在都成了教師。」

我遇見好幾個少年先鋒隊，長征的老手，都仍在他們十幾歲的年齡，負責組織並訓練在各鄉村裏兒童戲劇團體。

「農民們很遠地到我們的抗日劇社來，」危女士很驕傲地告訴我。「有時候，當我們離白區境界很近的時候，國民黨兵士們祕密地打發使者，請求我們的劇社，到邊境區域的市場鎮甸上去，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白軍和紅軍的兵士們，都放下他們的兵器，來到這個市場地方，看我們的表演。但是國民黨軍官們，如果知道了這事的話，永遠不會允許的，因為如果他們只要看見了我們的戲劇，國民黨的兵士們，不會再和我們的紅軍作戰了！」

可是，這些戲劇俱樂部最使我驚訝的，不是他們貢獻了對於世界任何藝術上重要的東西，

很顯明地這事他們沒有做到，而是因為雖設備簡單，它們能夠適合一種真正的社會需要，他們有最少限度的器具和服裝，但是用這些最原始的材料，他們產生了許多戲劇的深刻幻像。演者只領受他們的食物和衣服，和一個很小的生活津貼，但是他們每天研究，像一切的共產黨和少年先鋒隊一樣，而他們相信他們自己是為中國和中國人民而工作的。他們什麼地方都睡，很高興地吃任何人替他們預備着的東西，從一個鄉村到另一個鄉村很遠地走着，從物質享受的觀點來看，無疑地，他們是世界上最可憐地領受報酬的戲子，但是我似乎從來沒有看見過再比他們還快樂的人。

紅黨們幾乎寫着一切他們自己的戲劇和歌曲。有些是由有天才的軍官們捐助的，但大部份是由宣傳部的小說作家和藝術家預備的。有好幾個有名的紅色戲劇的諷刺劇，是由成仿吾寫作的，他是有名的文藝批評家，三年以前參加紅黨的。最近還有一些是丁玲——中國最著名的女作家——寫作的。她現在和紅軍在一塊。

在共產黨運動裏，比紅色戲劇隊更有力的宣傳武器是沒有的。而且也沒有運用得更巧妙的。劇目是常常改變的，幾乎每天改變的『活報』劇，新的軍事、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都成了戲

劇的材料。而疑點和問題，用一種幽默的，對於狐疑的農民階級可以懂得的方法，來解答了。當紅軍佔領了新的區域以後，也是抗日劇社，來平靜人民的恐怖，傳給他們紅色綱領的基本觀念，發散大量地的革命觀念，去征取人民的信服。舉例說吧，在紅軍的最近的遠征山西的期間，幾百的農民聽到了紅色的演劇者和紅軍，就成羣地來看他們。

危女士穿着乾淨的紅軍服裝，而且像一切蘇維埃婦女一樣，她剪了頭髮。從距離較遠看來，你或者以為她會是一個整齊的紅軍軍官。但是仔細一觀察，發覺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年青女人，帶着一種媚人的笑，和一種很適任的能辦事的人的態度。我以為她可以是一個露茜·司脫恩諾，就問她是不是已經結婚了。她搖着她的頭髮笑了，指着她的學生，她說：「一個丈夫能供給比我這裏更多的小孩嗎？！我還沒有結婚，革命沒有勝利，日本沒有打倒以前，我，會有時間做這樣的一種奢侈品的！」

而這就是抗日劇社目前的志願最好的總結。關於這事，我不懷疑，是「在藝術中的宣傳」運用到最極點了。

一三三 老農一席談

我旅行過了保安，走向甘邊與前方，我住在農民的草屋裏，睡在他們的土炕上，在那裏吃他們的飯，並快樂的與他們談話。他們都是貧苦的民衆，很和氣的招待客人。有些人們聽說我是海外來客，便拒絕接受我的錢。我記得有個纏足的老農婦，養了五六個小雞雛，她竟要宰了一半給我吃。我聽她對我的——個伴侶談：「我們不能讓一個洋鬼子到外邊談我們不懂得禮貌。」她叫我洋鬼子，並不見得便算失禮；因為許多中國農人是襲用着這種稱呼的。

後來，我要注意考察赤區的農民生活，看看他們是否與世俗的描寫，被稱爲土匪者相同，並且看看他們與一般農民不同之點安在，他們對於革命的認識怎樣，現在就把在陝北一個農村的談話記下來，因為這是一段很好的農民衷心之談，它指示出來赤區制度的優劣。

傅金魁是一個青年共產黨，他被赤黨交際部委派，來伴着我到前方去旅行，傅君像一般在後方的共黨一樣，他一見得到機會，與軍隊接觸，精神是特別愉快的，他看我就像天使一樣。同時，他也坦率的拿我當做一個帝國主義者，並且對我的整個旅行，是抱着顯明的懷疑態度。然而在

各方面，他都是誠懇幫助我，因此不久，我們便成了很好的朋友了。

一天晚間，在一個村莊，傅君和我找得一個地方，那里住了五六家的農戶。一個約有四十五歲的農夫，他看護着六個來回亂跑的小孩子，竟允許給我們以一切的方便。他給我們一間潔淨的小屋，燒好了熱炕，給我們的馬備上草料。他賣給我們一隻雞，要了五十枚，並且賣給我們一些雞卵。但是那間小屋，他却不取代價。他曾經到過城市，看見過外國人，但其餘的男女老幼，却都沒有看見過外國人，他們都圍着來窺視。有一個小孩因為駭怕，竟至哭起來了。

飯後，一些農民來到我們的屋里，給我一些煙，於是便開始談話了。他們問我的國家是否也有五穀雜糧，牛馬牲畜，是否用羊糞作肥料。一個農民問我的國內是否有雞雛，引得房主人嘶了一下，插着說：「凡是有活人的地方，一定有雞雛的。」他又問在我國內是否也有貧富之分，是否也有一種共黨和紅軍。我想要說我國只有共黨而沒有紅軍，真怕阻撓了他們的問題。

答了許多問題以後，我又提出來一些問題。我問他們對紅軍作什麼想法，他們起始訴苦說軍馬的食量太大。聽說當紅軍大學遷移騎兵部的時候，曾經在這村里停住了幾天，結果把他們存儲的草糧吃個一空。

傅金魁問道：「他們沒會給代價嗎？」他們馬上答道：「不錯，他們完全給錢了，這不是我們的問題。要知道我們的糧草是有限的，除備自用外，簡直沒有富餘。來年一月合作社能賣給我們嗎？這就是我們的問題。我們用蘇維埃的貨幣，能買什麼？甚至鴉片也買不到！」

上邊這段話是一個衣服襤褸的老頭兒，嘴裏含着二尺長的竹烟袋，瞪着眼睛說出來的。傅君承認不能買到鴉片，但是他說他們能夠在合作社里買到一切應用的東西。

我們的主人問道：「現在我們就能夠嗎？我們能買到像這樣的酒杯嗎？」於是他拿起來我們從西安帶去的紅色的假象牙杯。傅君承認合作社沒有紅色的杯，但却說那里有許多的布匹、洋燭、針、箭、火柴、食鹽等等。

一個農民問道：「我聽說你們每人得到的布不過六尺，這不是真的嗎？」

傅君不大相信，他想是有很多布匹的。他轉到抗日問題上來了。他說：「我們的生活和你們是一樣的苦，紅軍是替你們工農打仗，以免你們受日本和××黨的壓迫。即使你們不能買到所需要的布匹，並且不能得到鴉片，但那是一個事實，你們不納稅了，不是這樣了？你們不再向地主負債而失掉你們的房屋與土地，你們不是嗎？好了，老大哥，你們是願意白軍，還是願意我們？請答

復這問題。白軍對你們的收穫所給的是什麼？」

這時，一切訴苦都歸消失，而大家的意見也都一致了。我們的主人搖頭道：「老傅，絕對不是，絕對不是！如果讓我們選擇的話，我們喜歡紅軍。我一個九歲的兒子現在在紅軍里，就是我送去的。有誰不承認這件事？」

我問他們爲什麼喜歡紅軍。

那個說合作社沒有鴉片的老頭兒發表一篇熱烈的談論。

他說道：「白軍來的時候是怎樣？他們是盡量的勒索，永遠不會談到代價問題。如果我們拒絕，便要被當作共黨而逮捕了。如果我們盡量的供給他們，我們便無法納稅了。如果不能納稅的時候，又該怎樣？他們就要出賣我們的牛馬了。去年紅軍，不在此處的時候，白軍回來便把我的兩隻驢和四頭豬拿去了。驢是每隻三十元，豬都是長成的，每頭兩元。他們給我什麼了？」

「哎呀！他們說我欠租稅八十元，而把我的東西估爲四十元。他們向我再要四十元，我該怎麼辦呢？我再也沒有可以被剝削的了。他們讓我來出賣女兒，這是一個事實。我們這裏真有些是不得不這樣辦的。那些沒有牛馬和女兒可賣的人，都被囚到保安的監獄里去，其中許多人都凍

死或病死到那里了。」

我問這老人他有多少土地。

他帶怨恨的說：「土地」並且指着院外一道小河的那邊的一塊種着五穀和蔬菜的土地說：「那裏就是我的土地。」

「這土地值多少錢？」

他說：「這裏的土地如果不是平原地的話，是不值多少錢的。我們花二十五元，就可以買到那樣的一塊山地。值錢的只有驢、羊、豬、雞、馬和其他物品。」

「好了，那末，你的整個農場到底值多少錢？」

他仍然不願說出他的田地究值多少錢。最後他才算出來說：「你有一百元，便可以得到所有這些房屋、牛、羊等其他物品，並且連這座山都在內。」

我追問道：「對於這些東西，你須納多少稅？」

「一年須四十元！」

「那是在紅軍未來以前的事情嗎？」

「是的，現在我們不納稅了。但是誰又知道來年是怎樣？紅軍一走，白軍就來。今年是紅軍，明年就是白軍。當白軍來時，他們叫我們是赤匪，當紅軍來時，他們又到處找反革命的。」

一個年青的農民插言道：「但是有一個不同之點，如果我們的鄰人證明我們並未幫助白軍，那就百事皆無。但是如果遇到白軍，便是我們有一百個好人的名字來證明，而沒有地主的頭銜，白軍也得說我們是赤匪。這不是一個事實嗎？」

那個老人搖一下頭，他說上次白軍在此地的時候，曾經把那山坡上的一家貧農的全家都給殺掉。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問紅軍藏在何處，而那家人不肯說出。從此以後，人們都逃跑了。當紅軍再來時，我們這才又回來。

「如果白軍再來時，你們是否還是要跑呢？」

一個長髮白牙的青年人喊道：「噯呀！那我們一定得離開，否則他們要殺我們呢！」

他們起始敘述他們的罪狀。他們曾參加了貧民會，曾在蘇區投票，曾把白軍行動消息報告紅軍，有兩人的兒子在紅軍裏，另外一個人有兩個女兒在看護學校。這算罪不算罪呢？他們告訴我其中的任何一項，都夠得上槍斃。

但是現在有一個赤足的十幾歲的青年插上前來，爲談話所興奮，忘了這洋鬼子了。『爺爺，你把這些事都叫犯罪嗎？這些都是愛國行爲，我們爲什麼做這些事？不是因爲我們紅軍是貧民的軍隊，而爲貧民爭取權利嗎？』

他繼續熱烈的談話：『我們在以前有一個免費的學校嗎？在紅軍未帶來無線電之前，我們能得到世界的消息嗎？誰告訴我們現在世界的實情？你說合作社沒有布匹，但是以前曾經有一個合作社嗎？從前你的土地怎樣，不是給地主王家很大的抵押嗎？我的妹妹在三年前餓的要死，但紅軍來後，我們不是足衣足食了嗎？你說那是痛苦，但我們青年人只要學會看書，並不感到痛苦。我們青年人學會拿槍，而去打漢奸與日本，也感不到痛苦！』

青年說得上不來氣，靜了一下。我看着傅金魁君面旁泛着微笑。大家都很表示贊同，許多人們笑了。

談話幾乎到了九點鐘，已經過了睡眠時候了。我最高興的，就是因這是在傅君的面前舉行的。一般農民對傅君並不視爲怎樣有官吏的尊嚴。他們看傅君像一個伴侶一樣，實在說，傅君也像一個農人之子。

那個訴苦的老年人走了。當他走到房門的時候，他又對傅君耳語道：「老同志，現在保安有鴉片嗎？有一些許嗎？」

當他走開之後，傅君很憎惡的對我說：「那個老人是此地貧民會的主席，你相信嗎？他現在還要鴉片呢！這個鄉村還需要更多的教育工作。」

二四 黃埔學生劉子丹

當江西和福建的共產黨，在慢慢地建立抵抗南京的根據地的時候，在中國其他地方，也發現了紅軍。除了江西以外，最大的完整區域，是豫皖蘇區。包括揚子江中流兩個最富庶省份的大部，有二百萬人口。在這一帶的紅軍，是在徐海東和徐向前的指揮之下。徐向前是黃埔軍官學校的畢業生。

在他們西北的山中，另一個黃埔的學生——劉子丹，正建立現在在陝甘寧綏的蘇區的基礎。他是現代的魯濱·侯得，正和西北許多山中生長的人一樣，對於富人是特別仇恨的。在今日，劉子丹的名字，是窮苦的人民裏的福音，而是地主和高利貸的人們的鞭笞之神。

這位叛亂的戰士，是生於陝北的保安，是一個中農的兒子。他進過榆林中學，這學校設在長城的陰影之下，是陝西和蒙古騎兵交易的商業區。劉子丹在榆林中學畢業以後，考廣州黃埔軍官學校。一九二六年在黃埔畢業，加入共產黨，同時也是一個國民黨的青年軍官。一年以後，發生南京的政變，他從「清黨」運動逃脫了，而祕密地在上海作共產黨工作。一九二九年回到他的故鄉，在榆林組織了一些共產黨「仕官學生」，在同年，又領導一個在陝西的農民暴動。這暴動在華縣附近爆發的。（華縣正是現在國民黨和西北軍隊彼此對立的地方。）雖然這個暴動被血腥地鎮壓下去，但是從牠才生長出西北的第一次的紅色游擊隊。

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間劉子丹的事業，是一串敗仗、失敗、沮喪、逃竄、冒險的出死入生。中間還夾着一些被重行任命做軍官而被尊敬的時期，在他領導下的許多小隊，全被擊潰了。有一次，他回到保安的時候，僅剩了兩支手槍，可是在一星期後，又招集了一支新軍隊。他被寬赦了兩次，在政府軍隊裏給了一種職務，這主要地是因為他在陝西祕密結社裏有勢力。他的冒險精神、勇敢和粗魯，取得了普遍西北的聲援，而造成了「槍砲不入」的民間傳說，直等最後，一九三六年三月，在紅軍出征山西的時候，他領着衝鋒隊，進攻敵人的要塞的時候，被殺身死。這個要

塞的佔領，使着紅軍能渡過黃河。

從我在那裏所能得到的一切單獨各別的證明裏看來，在陝西頭兩三年的鬥爭裏，地主們和官吏們殺的太多了——這似乎是無疑的。一般武裝了的農民，在長期被鎮壓的仇恨裏解放出來，進行搶掠，把俘虜的人帶到他們的巢穴裏，勒索贖取，使他們自己像普通土匪一般行動。但是到了一九三三年，劉子丹的部下佔領陝北黃土山裏許多的縣份以後，共產黨在榆林才組織了一個政治部，來指導劉氏的軍隊。在一九三三年春，第一個陝西蘇維埃和正式的行政組織才建立起來。實行和江西相同的綱領。

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間，陝西紅軍有相當的擴展，改良了他們的軍隊，和蘇區裏的情形也相當穩定了。劉子丹佔領了西安外邊的臨潼，並圍攻省城數日，可是沒有勝利。紅軍的一支陷落陝西的南部，在那裏建立蘇維埃區。他們在那裏和楊虎城——陝西的省主席（現在是紅黨的聯盟了）的軍隊，幾次激戰，是互有勝敗。以後軍隊的紀律逐漸改進，土匪的成份逐漸消失，陝北和甘肅的農民，對紅軍擁護才慢慢的加強。在一九三五年的終尾，蘇維埃統治了十七縣。當紅軍從江西和福建的根據地撤退的時候，劉子丹的部下加強了他們自己的力量，很少被南京

注意，直到最近。

二五 災荒與貧困

想要知道，赤化運動迅速在西北發展的由來，並不必追溯很遠。一九三五年，國際聯盟的專家司丹樸博士（A. Stanger），曾爲南京視察中國的這一部份。在他所作的報告裏，描寫了中國農民的災荒與窮困。在他作的『西北各省及其發展之可能中』（這書不是大衆讀物）司博士曾有幾行述說擁護西北土地革命的基礎。

他指出來，在幾年前的西北大災荒中，在一個縣份裏，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是死於非命了；在另一個縣分裏，有百分之七十三，等等。……他指出的估計，僅在甘肅省，就死了二百萬人（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這些死亡的大多數，如果官廳會禁止堆藏五穀，或者混戰的軍閥，不干涉救災供給的運送，是可以得救的。

現在根據這個日內瓦觀察者的報告，再把國民黨所統治的西北區域略述一下：

「在一九三〇年的大災荒裏，用三天的糧食供給，可以購買二十畝地。本省的富裕階級，利

用這個機會，建築起來大的財產，而自耕農的數目日漸減少了。許多的地荒廢了，大部分集中到地主官吏們的手裏。特別在甘肅省，有廣大的可耕而沒耕的土地。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的飢饉中，土地被地主們用極端的廉價買去了。這些地主們，從那時起，發了大財。

『在陝西，抗租拒稅，不納田賦，是被認為一種光榮的事。所以富足的地主們，照例是不納稅的。……而使人最痛心的，是向那些在飢饉時期中放棄了他們的土地的農民，索取他們逃難的時期積欠的田賦。不交繳積欠的田賦，土地就被沒收了。』

至於在國民黨的甘肅呢？司丹樸博士說：

『在過去的五年裏，甘肅的稅收，平均每年超過了八百萬。這甚至於比中國最富足的而捐稅最重的省份的浙江，還更要重些。人民所繳納的數目，比起公佈出來的數目，不知要高出幾倍。第一，捐稅的徵收者，是會留下所徵收的數目的一部分的，而且在許多情形之下，會是很大的一部分的。第二，在由省政府縣政府所徵收的捐稅之外，必須還要加上軍事領袖們所課取的數目。這數目官廳公開地估計着，超過一千萬。另外一種對於居民的開消，是本地的民團——這民團在許多情形之下，都演變成爲一羣土匪，依靠鄉村的供給過活。』

在這一篇短文裏，我不打算分析西北的農村經濟，但是參照一下我在甯夏省政府所找到的一篇很有重大意義的文章，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這篇文章列舉了國民黨委派的馬鴻逵將軍，在本省所徵收的捐稅，包括下面這些種類：營業稅、家畜稅、駱駝稅、運鹽稅、食鹽稅、鴉片烟燈稅、羊稅、商人稅、捐夫稅、鴿子稅、土地稅、中人稅、食品稅、特別食品稅、土地附加稅、木材稅、煤炭稅、皮革稅、屠宰稅、船稅、灌溉稅、鐵匠稅、蔬菜稅。這還沒有包盡了所有徵收了的零星的捐稅，但這已經足夠提出一種意見：就是在這樣地城裏，人民對於國民黨的愛戴是可想而知了！

甘肅的一個傳教師告訴我：他看見一些農民，爲納稅的緣故，把他們的屋子木牆斫下來，（在西北木材是很貴的）運到市場去販賣，換了錢去納稅。他說當紅黨剛來的時候，許多農民的态度，雖然不是友愛的，倒是一種不關心的態度。他們的信仰是：「不會有更壞的政府了！」

紅黨是否有較好的表現呢？和我談過話的一切沒彩色的批評家，都承認紅黨們用積極改變佃農，貧農和中農的生活方法，在農民階級裏創造了經濟基礎。這些佃農，貧農和中農，佔人口的大多數。所以達到這層的原因，是十分簡單的。在新蘇區裏廢除第一年的各種苛捐雜稅，並保證在將來只採用一種很小的土地和營業的累進稅。其次是把土地分給那些「沒有土地」的。

農民和開拓廣大的荒地。

紅黨們普通把農村人口分成以下的幾種：大地主、中小地主、富農、中農、貧農、佃農、農業勞働者、工業勞働者、流氓無產階級和自由職業者——即教員、醫生、技師等。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公佈的西北蘇維埃土地法，規定沒收一切地主們的土地，沒收富農們所有不由自己勞力耕種的土地。不過，地主和富農們，還留有足夠他們自己勞力所能耕的土地，在土地並不缺少的區域裏——在西北是有許多這樣的區域的——居留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在實行中幾乎並沒有沒收，而只是荒廢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被分配了。有時候也實行一種好質土地的重行分配，貧農們給較好的土地，而地主們分給同樣數目的較壞的土地。

地主是甚麼東西呢？依照共產黨的定義，是很簡單的。任何農民，不是自耕而食，而專靠租給別人土地，取得他主要的收入的，叫作地主。由這一個定義，高利貸者被歸入到地主一類裏，也受同樣的待遇。按照司丹樸博士記載，從前在西北的高利貸利率，高到百分之六十，在緊困的時候，或者比這更高。他說在有些情形之中，農夫們已經歸還了原借款總數目的兩倍或三倍，但仍然欠着比他們所借到的數目更多。雖然在陝西和甘肅的土地是很便宜的，但沒有資本的農民，想

積蓄些錢，去買一塊土地，簡直是完全不可能。我想起和一個甘肅的農民的談話來。他是十五年前移民到那個區域裏，但永遠沒有置起一塊小地，雖然那裏的土地只有十二元錢一畝。當他有工做的時候，他的工資平均是一毛錢一天！

上面所提到的階級以外的土地是不被受沒收的。最窮困的農民，佃農和農業勞動者們，都供給了足夠維持他們的生計的土地。現在蘇維埃土地法的主要的目的，在供給每一個人，足夠保障他和家室的一個美滿的生活的土地，而這正是農民階級最緊迫的要求。

土地問題——沒收和重行分配——在西北比在南方是簡單些。因為在這裏，廣大的田產，從前是被官吏們，捐稅的徵收者們和不在地主們的所有。在許多的情形之下，沒收了這些土地，貧苦農民階級的目前要求，就真滿足了。用不着牽扯到居留地主們和富農們。這樣，蘇維埃不僅從沒有土地的農民階級，用給他們土地的方法，創造了經濟基礎的擁護。而且在某些情形之下，用廢除捐稅及其他剝削的方法從中農取得了感情。而在有幾個例子之下，在反日運動的基礎之上，受到了小地主們的幫助。有幾個有名的陝西共產黨員，是來自地主階級的。

對於貧農的以外的幫助，是用蘇維埃貨幣的借款的形式而實行的。利息是很低，或者完全

不要利息。高利貸自然是完全廢除了。去年在陝西，大量的棉花和麥的種子，在生產價格之下，分給貧農們。好幾千件在紅色兵工廠裏做成的農業器具，供給沒有土地的農民們，去開墾荒地，在舊的蘇維埃區域裏，鴉片完全廢除了，而這件事幫助了農業生產品的增加——紅黨們認為這是歸功於他們的。在保安設立了一個初級農業學校，而且告訴我，正在計劃開辦一個家畜農業學校，只等一個從上海聘來的專家，一秘密到來以後，就可以實現。

二六 政治影響

但是這些個辦法是否我正對西北產生了許多根本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改變呢？我們必須盤問人民本身，來尋求答覆。不過，同時反映出最有意思的政治影響，是爭取了大部政府軍隊們，對紅軍計劃的擁護。爲爭取這些財富最多的敵人們的同情，他們必須加重對敵人的說服運動，這樣張學良的事件發生了。西北剿匪代理總司令張學良氏，他把自身的前途，以及他的軍隊前途孤注一擲，替紅黨請命，要求停止一切內戰，建立中國抗日的聯合戰線。

引用他最近發表的通電裏的話：

『幾百萬的中國金錢，中國生命，和中國財產，被捲到不斷地內戰裏，和不斷地追逐所謂土匪裏。這些土匪們，儘管他們的政治觀點不同，然而仍舊還是中國人，假如政府當局樂於考查，他們是有愛國心，理智和革命的精神的，他們是能被利用服務國家的。』

自從我訪問西北以後，自那個宣言發表以後，自從中國政局在危機中加深了以後，紅黨已經驚人地擴張了他們的區域和勢力。今天，假如我們要畫一幅紅區領域的地圖，將要包含：西蘭公路以北的甘肅的大部，渭河以北的陝西的全部，沿着河南邊境的陝西南部，黃河以東的甯夏全部，以及綏遠的東南端角上。假如紅軍能繼續保留這個地方，當做一個『試驗區』——這似乎是在國共復行合作的一個可能的基礎——那麼，他們在這個區域裏，能成就些什麼呢？他們已經成就的是些什麼呢？

二七 文化和經濟

在文化和經濟方面說來，陝西、甘肅和甯夏，過去自然是中國最落後的地域。過去實在是沒有機器工業，而紅黨在他們的掌握的許多區域裏，建立了從來未有的新聞紙。管理吳起鎮紅色

工廠的工程師，是一個受過外國訓練的中國專家，他放棄了在上海的一個每年有一萬塊錢收入的職業，不要任何東西，來替紅黨工作。因為他的燒用木炭的發動機，而成爲這個地方的奇物。像這樣的機器，沒有一個農民從前看見過。

但是在我們走進紅色中國的『工業世界』之前，是應當訪問一下農民的。看看他們是什麼樣子，紅色統治在他們身上成了些什麼功績。是不是他們政治生活裏有真正的發言權，他們對紅軍作何感想，他們是一些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而且，最後，他們和『白』區裏的農民，是有甚麼不同？中國農民，一向是被認爲討厭組織，紀律，集體行動，及一切家庭以外的社會活動的。『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這是中國一句老的格言，認爲是足以代表農民的性格態度的。紅黨們能夠取消這個好幾世紀古老的保守的外形嗎？

二八 僅有的城市

在我到前線的路上，在保安的西北的走了幾天，我駐下去拜訪陝西的蘇維埃『工業中心』——吳起鎮。吳起鎮不是因爲在工業科學上有任何成就——讀者不久就會知道——而著名

的，乃是因為牠是那裏僅有的鎮市！

在周圍的幾千里內，只有半遊牧的鄉村，人民安全像他們幾千年以前的祖先一樣，住在洞穴的屋子裏。許多的農民，仍然留着挽在頭上的辮子。馬、驢子和駱駝，是交通工具中的唯一的東西。在這裏燈光是用菜油，蠟燭是種奢侈品，電光是人所不知道的東西，而外國人像在非洲的愛斯基摩人那樣地稀少。

在這個中古世紀的世界裏，突然來了蘇維埃工廠，機器轉動者，一羣的工人們，忙碌地生產紅色中國的工具和商品，這是非常驚人的事。

我知道在江西的共產黨，反抗着缺乏海口的重大的障礙，和切斷他們與任何大的近代的工業根據地的接觸的敵人的經濟封鎖，而建築起來幾個茂盛的產業。舉例說吧：他們舉辦了中國最富足的銻鑛，每年出產這種最貴重的鑛物超過一千萬磅——祕密地買給廣東的銻的壟斷專家陳濟棠將軍。在吉安的中央蘇維埃印刷工廠，有八百以上的工人。許多的書籍、雜誌和一個『國家』的報紙——紅中日報——在這裏印刷發行。

在江西也有紡紗工廠，毛織工廠，和機器作坊。小的工廠，生產足供給他們簡單而需要的工

業品，紅黨們自己說：在一九三三年他們有超過一千二百萬元的『對外出口貿易』，這種貿易大部分是由南方敢於冒險的商人經手的。他們越過國民黨的封鎖，而得到很大的利益。但是製造品的大部分，是手工業和家庭工業。這些生產品是經生產合作社發賣的。

前江西人民經濟委員吳亮平氏告訴我：蘇維埃有超過一萬所的『生產分配』的合作社，這些都是人民所有，由人民辦理的。雖然這個數目，是比國際聯盟調查員們的估計，高了很多，但無疑地，紅黨們在這種集體事業上，是成功的。

實際上，國民黨自身正在企圖在南方一帶，模倣紅黨們的這種制度，但直到現在，結果是在一種嚴密地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之下，舉辦這種合作社，假如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極端困難的。

可是在西北，我從沒有想到會有任何工業。紅黨們在這裏，比在南方，是有更大的障礙要克服的。因為這裏在蘇維埃建立以前，是連一個小的機器工業都定全沒有。在整個的西北——在陝西、甘肅、青海、甯夏和綏遠——從面積上來說，幾乎等於整個歐洲，可是它們聯合起來的機器工業總投資，還比不上一個大規模工廠的一個支行，例如福特汽車公司的支行。

在西安和蘭州有一些小的近代工廠，但大部分都依靠着東方很遠的大的工業中心。在北任何的大規模工業發展的可能性，必賴於從外界借用技術和機器，才能發生。假如在這一帶的兩個最大的城市——西安和蘭州，這種情形是真實的話，那麼，佔領甘肅、陝西、甯夏等更落後的地域的紅黨們所遭受的困難，是很明顯的。

自然，「封鎖」切斷了紅黨們的輸入機器和「輸入」技師。但是關於後者，紅黨們說他們的供給，在現在是很富足的。只有機器和原料，是最嚴重的問題。僅爲着要得到少許的機車、紡織機器、引擎或者鐵塊，紅軍們打了許多的仗。幾乎屬於機器這類的任何東西，現在都是由「俘虜」而來的。舉例來說：在去年他們進征山西省，他們奪取了機器、工具和原料，用驢子馱運，一直越過了陝西蔓延的山脈，到他們的奇怪的萬峯環繞的工廠裏去。

在南方的紅黨們，當他們來到西北以後，推動了一個「經濟繁榮」。他們經過了二萬多里路，過了世界上最困難的道路，帶着許多的機車、鋸床、鉗子、鑄模、滾機、等等，他們帶來了幾十架勝家公司（Singer）的縫紉機，用這些機車，現在裝置了他們的衣服工場。他們從四川的紅色礦山帶來了銀子和金子。他們還帶來一些石印石和輕的印刷機。紅黨們對於馬和驢子，很重視和

愛好，特別是對於那些載運了他們從南方帶來的重担的有力牲口們，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蘇維埃工業，現在包括了在保安和肅州的衣服、軍裝、鞋、和紙工廠，在定邊的地氈工場，在永平的礦山，那裏生產中國最廉價的煤，和在好幾個毛織物棉花紡織工廠——一切這些工廠，都努力生產充足的貨物，去實現充實陝西和甘肅的四百個合作社的計劃。依照人民經濟委員會毛澤東說來，現在的「工業計劃」的目的，是使紅色中國能夠「經濟自足」——充分地強壯，能抵抗××黨的封鎖而自存——如果南京政府拒絕接受共產黨「聯合戰線」的建議，和停止內戰的話。

最大的而且最重要的蘇維埃國家事業，是在鹽池——甯夏邊境沿着長城的最大的鹽湖——的精鹽工廠；在永平和延安的石油井，牠出產氣油、石油、凡士林、蠟、蠟燭，和別的副產物。在鹽池的鹽的貯藏，是中國最豐富的，在紅黨佔領鹽池以後，他們取消了國民黨壟斷全部出產品的習慣，允許把出產的一部分，交給長城以北的蒙古人，因而取得了蒙古人的同情。在陝北的石油井，是中國僅有的石油井。在佔領永平以後，紅黨們開鑿了兩個新的油井，據說比永平和延安在「非土匪」的手中的任何時期，都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的生產。

並且吳起鎮是在紅區裏最大的工廠工人的集中地點，而且牠的重要，也是因為牠是紅黨們主要的兵工廠的所在地。這裏也是媚人的劉羣仙女士的總部——她從前是上海的紡織工人，莫斯科回來的留學生，現在是紅色工會婦女部的指導員，年齡二十九歲。

我在吳起鎮停留了三天，訪問了在工廠裏的工人，考查了他們的工作情形，參觀了他們的戲院和政治會議，讀了他們的壁報及文字書籍，還有談話。我加入了一個籃球遊戲，在一個小隊裏——由外交部使者傅金魁，一個政治部工作的能說英文的青年的專門學校的學生，一個紅色醫生，一個工人和我自己組成的。我們和兵工廠籃球隊對敵，遭遇了最可恥的戰敗。第二天早晨我知道了：三十一歲的我，不能算是年青了，因為我的骨頭僵木了，酸痛了。

二九 兵工廠一瞥

在吳起鎮的兵工廠，像紅軍大學一樣，是在一大排在山旁邊建築起來的圓頂屋子做成的。屋子是涼快的，很通風的，由在牆的四角挖的通氣穴的光線照耀着。而主要的好處，是完全能預防空中轟炸的。在這裏我看見了一百多個工人，製造手榴彈、戰壕鎗、火藥、手槍、小的炸彈、槍彈、

和一些農具，修理部正在修理許多捆破壞了的來復槍、機關槍、自動來復槍、手提機關槍。可是兵工廠的出品都是很粗糙的，都被用去武裝紅色游擊隊，正式的紅軍隊伍，幾乎完全是用敵人軍隊奪取過來的槍械和子彈去供給的！

兵工廠的管理員何錫揚（譯音）氏，帶領我參觀了各個部門，介紹給我他的工人，並且告訴了我一些關於他們他們工人的事情。何氏年三十六歲，未婚，在九一八以前是有名的瀋陽兵工廠的一個技師。九一八以後，他走到上海，在那裏參加了共產黨，以後走到西北，入了紅區裏。這裏的許多工匠，都不是「門外漢」。許多的人，從前都是在漢陽中國最大的鐵工廠裏做工，有少數的一些在國民黨的兵工廠裏做過工。我會見了兩個年青的上海工匠頭和一個修理專家，他們給我看了從瓜麥怡和洋行公司（Jardine Matheson and Co.）慎昌洋行（Anderson Meyer Co.）和上海電力公司等等有名的英美公司來的很好的推薦信件。還有一個是上海機器廠的工頭。還有些是天津、廣州和北平的機工匠，而且有些都會和紅軍一同「長征」過。

我知道在兵工廠裏的一百十四個機器匠和學徒裏，只有二十個是結婚了的。這些結了婚的妻子們，都和他們一塊住在吳起鎮，或者當工廠的工人，或者當黨部的職員。在兵的工廠工會

裏——這工廠代表了紅區裏的最熟練的勞工——黨員佔很大的百分數的。他們告訴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參加了共產黨和共產青年團的。

除了吳起鎮的兵工廠以外，還有織布和制服工廠、鞋工廠、織襪工廠和一個帶有醫生的藥房，這醫生是剛從山西一個醫藥訓練學校來的，他的年青而漂亮的妻子和他在一塊當看護。他們兩人在去年冬天的山西進征中，都參加了紅黨。在附近也有一個醫院，裏面有三個值勤的軍隊裏的醫生，主要地是醫治受傷了的兵士。還有一個無線電台，一個簡略的試驗所，一個合作社，和一個軍需根據地。

除了兵工廠和軍裝廠外，大部分的工人，都是年青的，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或三十歲的婦女。『同等勞動，同等報酬』是中國蘇區裏的一個口號，在這裏對於婦人們，是沒有工資區別的。勞動在外表上，比在蘇區其他一切人，都得到優先的經濟待遇。也勝過紅色指揮官，因為紅色指揮官，並不領受正式薪金，只是少數的生活津貼，而這津貼，要看會計處的負擔輕重來決定的。

劉羣仙女士對我述說了工作情形，工廠裏的工人，每月得到從十元到十五元的薪金，宿膳由政府供給。八小時的工作日和六天的星期週。當我訪問他們的時候，工廠都是一天二十四小

時開動着，一天換三班工人！大概是中國最忙碌的工廠吧！工人們被保障有免費的醫藥待遇，和受傷的卹金。女子們在受孕期中，有四個月的領取工資的休息，而且能領到他們的「社會保險金」。這種「社會保險金」是由扣除工人的工資的百分之十，和由政府加上同樣數目的一種基金準備的。政府也捐助全部出產的百分之二，爲工人們的教育，娛樂等等消費。這些款項，都是由工會和工人的工廠委員會，一同管理的。

三〇 他們向所未知的事情

一切這些，聽起來，是很進步的；雖然，或者離共產主義烏托邦還太遠。在蘇維埃爲生活的鬥爭中，這些個情形已經實現了——這事實是很有趣味的。牠們是如何原始地實現了，那是另一個問題！他們有俱樂部、學校、廣大的寄宿舍，一切這些都是實在的；但是也有黃土地版的洞穴房屋。可是沒有洗澡的噴水器，沒有電力。他們是有食物的，但飯食只是些小米、蔬菜，有時候有些羊肉，可是沒有茶，沒有糖，沒有牛奶，沒有咖啡，他們用蘇維埃貨幣，收集他們的工資和社會保險金。這是沒有關係的，但是他們用蘇維埃貨幣所能買到的物品，是很嚴密地限制到必需品上——

而且這些必需品也並不用買到很夠用的！

普通的美國工人和英國工人會要說：『不能忍受的呀！』但對於這些人們，很明顯，不是這樣的。要明白這是爲什麼：你必須拿他們的生活和在中國別的地方的制度相比。舉例說吧，我看過別處無數的工廠，在那裏很小的男女童工。坐着或站着做他們的工作，一天作到十三小時，才很疲倦回到家裏睡。我也記着在絲織工廠的小女孩們，和在棉花工廠的慘白面孔的青年婦女們——他們這些人，像在上海的大多數的工廠裏的，實在是當四年或五年的真正隸奴，而賣給這些職業的。白天或夜裏，除非有特別的允許以外，不能夠離開這種很嚴密的監視。而且我記着：在一九三五年之中，有二萬九千以上的屍體，從上海的街頭，河流和運河檢集起來——這些屍體，是無家可歸的窮人，或者是他們不能餵養的兒童和飢餓的嬰兒們。

那麼，在吳起鎮的這些工人們怎樣呢？雖然是在開辦期中，在這裏至少一種康健衛生的，有運動的，呼吸着清潔的山中空氣，自由、尊嚴和有希望的生活。在這裏是有發展的。他們知道沒人從他們身上榨取金錢，我想他們是知道是爲他們自己和爲中國而工作的。而且說他們自己的革命家。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明白了：爲什麼他們對於每天二小時的讀書和寫作，他們的政治課

程，和他們的戲劇談話，是那樣地認真；爲什麼他們在遊戲、文學、公共衛生、壁報、『工廠效能』等等的組織與個人之間的競賽裏，爲着爭取那很可憐的獎賞，而激烈地競賽着。一切這些事情，對於他們都是真的，是一些他們以前所不會知道的事情，是一些在中國別的任何工廠所永遠不能知道的事情。他們似乎很感謝，生活的門是爲他們打開了！

且說，一切這些事情，對於任何像我這樣的中國通，是很難相信的。關於它的重要意義，我仍然是很迷惑的。但我不能否認我所看見了的證據。這裏篇幅有限，我不能仔細敘述這些證據。我應該說出十幾個我談過話的工人們的故事。從他們的壁報的論文和批評中引用的話，給你們看。這些壁報是用幼稚的『新文字』的筆墨胡亂的寫成的，有許多由專門學校的學生的幫助譯出了。我應該告訴你，我所參加的政治集會，和由這些工人們所創造的和排演的戲劇。我還應該告訴你許多小的事情，去補足那些不易明瞭的敘述。

三二 簡直沒有時間唱歌

但是當我一邊寫着的時候，我偶然想起了一件這樣的『小事情。』我在那裏遇見了一個

電氣工程師，一個名字叫做朱擇志（譯音）的，很活潑，但是很細心的共產黨員。他很熟習英文和德文，是個「力學」專家，而且著了一本在中國用的很廣的工程學教科書。他曾經在上海電力公司，以後在安得生公司。最後在中國南部執行業務，是一個能幹的工程師和有效能的人。每年有一萬塊錢的收入。他放棄這種職務，離開他的家庭，來到陝西的這些曠野的僻塞的山裏，不爲任何報酬對紅黨們貢獻他的服務。這真是使人不相信的！這種現象的背景，是一位慈愛的祖父，寧波的有名的慈善家，他臨死的時候對青年的朱的誥誡是：「貢獻你的生命，提高民衆的文化水準。」而朱決定了最快的辦法，就是共產主義的辦法。

我想到朱的這件事情來，是有點驚心動魄的殉道者和熱心家的精神。對於他，這是一件稀罕的事。而且他期待着一切別的人也這樣地想。我相信，當他看見了這裏的一切的人們，明顯地都是很快樂的時候，他一定驚訝的。當我問他，他對於這裏意見如何？他很莊重地回答，他只有一件嚴重的批評。「這些人們用太多的光陰在唱歌上面了！」他埋怨地說。「我們簡直沒有時間來唱！」

我覺得這句話，完全代表了這個奇特的陝西蘇維埃的「工業中心」的青年的勇敢的意

見。

三二 跟彭德懷在一起

關於中國紅軍怎樣並爲什麼發生成長起來的這個問題，我想介紹一段我和彭德懷的談話，這段談話最有興趣。我記得當時我們兩個人是坐在豫旺壩舊縣公署的房子裏，這房子是一個兩層的建築物，有一個帶欄杆的走廊——從這個走廊中，穿過平原，可以遙望着蒙古。

在豫旺壩高大的城牆上，老遠有一羣紅軍號兵在那兒練習吹號，又在城市的一角上，正飄揚着一面大紅旗，黃色的鐮刀和斧頭標誌，在摺縐的旗面上時隱時現。我們又可以看見在一邊有一個潔淨的院落，那兒正有一些回民婦人在淘米做飯；另一邊，有一條繩子掛着不少洗出來的衣服。在遠處的一塊方場上，有好多紅軍兵士在那裏練習爬樹、跳遠和扔手榴彈。

彭德懷和毛澤東同鄉，是一位湖南人，可是他們兩個人直到紅軍成立以後才遇到一塊的，他操一口湖南土音，像機關槍那樣快。只有當他慢說和語句簡單的時候，我才能聽得懂——可是他這個人却很不耐煩慢慢說話。我這次和他談話，賴有一位英語很好的北平某大學畢業學

生，給我謄譯，我希望這位青年朋友永遠健康，或者將來他能有一天看到我這篇對他深致感謝的文章。

三三三 游擊戰的起因

彭德懷開頭說：『第一中國發生游擊戰爭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經濟破產，特別是農村的破產。帝國主義，地主，和軍閥混戰，全在一起去破壞農村經濟的基礎，如果不剷除這主要敵人，則農村經濟永遠不會恢復。重稅剝削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經濟侵略，加重了農村破產的速度，另外更有地主們爲之推波逐浪。土豪劣紳們在農村裏的殘酷剝削，使大多數農民的生活，陷於極度困難，農村裏的失業，非常廣汎。惟其如此，所以農村裏的貧苦階級，都在擦拳摩掌，準備爲改變現狀而戰！』

『第二，游擊戰爭之所以獲得發展，是因爲中國內地的落後性。交通的阻塞，鐵路橋樑，以及公路的缺少等等，使民衆們能夠武裝起來並組織起來。』

『第三，雖說中國的戰略中心地點，都或多或少的被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然而這種統治畢

竟是不平衡，不配合的。在各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之間，事實上存在着廣大的間隙，在這些間隙處，游擊戰爭能夠很快的展開。

「第四，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已經把革命的觀念廣汎地種入人心，就是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發作以後，城市裏的屠殺雖在盛行，但許多革命者還是不屈不撓，去追求有效的反抗方法。不過，由于帝國主義與買辦對於大城市聯合統治的特殊制度，由於一開始缺乏武裝力量，所以很難望在城市裏取得革命的根據地，於是，遂有成千成萬的革命工人，智識份子，以及農民，回到了鄉間去領導農民武裝暴動。本來，不可忍受的社會經濟條件，已經在農村裏造下了成熟的革命條件，這裏只要有正確的領導和羣衆運動的組織形式與戰鬥的目標，就夠了。

「以上這些因素，遂使革命的游擊戰爭如火如荼的展開，獲得了偉大的成功。當然，我說的很簡單，還未曾突入問題的深處。

「除了上述的原因以外，游擊戰爭之所以能獲得成功，游擊隊之所以能長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就是因爲我們的武力能和羣衆打成一片。紅色游擊隊員，不僅是戰鬥的武士，同時也是政治宣傳員和民衆的組織者。他們每達到一個地方，就把革命的種子帶入；他們很耐心的和農

民羣衆解釋紅軍的真正任務，使他們明白只有經過革命，才能實現他們的需要，並給他們解釋，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他們。

三四 游擊隊的革命特質

「但是，開下方才會問爲什麼有些地方游擊隊發展得很快，並變成一枝堅強的政治力量，而在別的地方則很快的即被撲滅，這的確是一個很有興味的問題。

「首先，要記着中國的游擊戰爭，只有在共產黨的革命底領導之下，才能獲得成功，因爲只有共產黨才願意並能夠去滿足農民的要求，了解在農民中進行深刻的，廣泛的，經常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之必要，而且，也只有共產黨，才能履行在宣傳時所給予農民的諾言。

「第二，要記着，一個活潑的游擊隊底領導，必須要堅決，勇敢，有大無畏的精神。在領導方面如果沒有這些特點，則游擊戰爭不特不能成長，而且在反動勢力進攻之下，只有一天一天歸於零落破碎。

「因爲羣衆們只對於實際解決他們的日常生活問題，感到興趣，所以只有立時滿足他們

的迫切要求，游擊戰爭才能發展開來。這就是說，必須要很快的解除了剝削階級的武裝，使之不能動員。

「游擊隊員永遠不能夠靜止；否則就是自取滅亡。他們必須經常的擴展，必須在他們的周圍，不斷的建立新的外圍區域與武裝團體，以資掩護。政治訓練必須和每一個鬥爭階段平行，而當地的領袖必須從每一個新團體中發展出來，以增厚革命陣壘。自然，從外部介紹進來的領袖並不一定能很多，然而如果不能從地方羣衆中經常的造就新的領袖，則游擊運動將永遠得不到最後的勝利。」

三五 紅軍是不可克服的

以上彭氏的敘述，是基有興趣而且也很重要。不過如是不能的話，我總願意知道紅軍作戰的一些原則——這些原則使紅軍能對付比它器械優良好多倍的敵人，而且復幾乎成爲一個不可戰勝的力量，讀者如果讀過勞倫斯（Colonel Lawrence）的傳記和他所經歷的戰役，一定會不期而然地把紅軍的戰術跟這位偉大的英國機動戰天才家的戰術互相比較，紅軍和阿

拉伯人一樣，實行陣地戰的時候很少，而且也鮮平常；但是紅軍又和阿拉伯人一樣，在機動戰中，却表現出來不可戰勝的威力。

在去年十二月陝變以後，一般人都已經知道，被派去剿共的張學良將軍和紅軍停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在過去歷次戰役中，已經深深領略了紅軍的巧妙戰術，而且他相信能夠聯合他們抗日。張將軍和他手下的好多官員——都是狂熱的抗日者——和紅軍戰鬥了三年以後，都堅決相信，將來和日本作戰時，中國必須要倚賴於優越的機動戰術和游擊戰術，於是乎，他們乃渴欲知道在過去十年的戰爭經驗中紅軍所學習的游擊戰術和戰略。

本來，關於這些點，我在這次談話以前就會問過彭德懷。我當時問他：「你能夠把紅軍游擊戰術的原則，提綱挈領地歸納起來嗎？」當時他認為可以，並預先寫好一些小單，這次拿出來唸給我聽。至若關於這個题目的詳細紀述，他又介紹我一本毛澤東寫的小冊子——在蘇區出版——不過可惜我並沒有找到。

三六 戰線上的指針

彭德懷給我解釋：「假如一個新開闢的游擊隊若想得到成功，則必須遵循某些戰術上的原則，這些原則都是我們從長期的經驗中習得的，雖則依照情況可以酌予變更，但我相信如果離開這些原則過遠，則一定會歸于消滅。簡單來說，這些主要原則可以歸納如下：

「一、游擊隊必須避免每一個失敗可能性很大的戰鬥。除非看到有勝利的把握，不應輕易交綏。

「二、凡是領導很好的游擊隊，都應當以奇襲爲主要進攻戰術。陣地戰必須避免，本來，游擊隊並沒有輔助的兵力，沒有後方，也沒有給養綫和交通綫，而敵人則一切皆有。因此，在長期的陣地戰中，敵人就能得到各種便宜，而一般說來，游擊隊勝利的機會是和戰鬥時間的延長成正比例而消失的。

「三、在每次交綏之前，必須要做一個慎密而精細的進攻計劃，特別是退却計劃。任何一個進攻，事先如果沒有完善的準備，則游擊隊常常會被敵人暗算，優越的游擊戰術是游擊隊的最利益，但如果用之不當，則等於自取滅亡。

「四、在游擊戰爭進展的過程中，必須要用最大的注意去提防民團——原來民團就是地

主豪紳們最前方的，最後方的，而且也是最有決定作用的抵抗綫啊。對於民團，必須用軍事力量加以摧毀，不過假如是情形允許的話，也應該予以政治的克服，俾爭取羣衆到這邊來。但無論如何要記着，假如一個地方的民團不解除武裝或使之不能動員，則絕對不能動員該地的羣衆。

一五、在和敵人堂堂正正作戰的時候，游擊隊的數目必須超過敵軍。不過，若當敵方正式軍隊正在移動中，休息時，或警戒疏忽的時候，則找好敵線的要害地方，用較少的隊伍即可來一個疾風疾雷的襲擊。在這種場合，時常百人的突擊隊即可對付敵軍成千成萬的大部隊，在實行此類攻擊時奇突、迅速、勇敢、不動搖的決心，算無遺策的機敏性，以及選中敵人的要害，這些都是取得勝利所絕對必需的條件。自然，惟有富有經驗的游擊隊，對此才能勝任。

一六、在實際戰鬥中，游擊隊自己這方面的戰線，必須有最大的伸縮性。如果忽而發現事先對於敵軍的實力，準備戰鬥力估計錯誤，則必須用疾風迅電的速度退出火線，也正如向敵人進攻時那樣敏捷一樣。

一七、在戰術上，凡誘敵、分敵、欺敵、激敵、埋伏，都必要靈活運用。那些戰術，中國古語稱爲聲東擊西。

「八、游擊隊必須避免和敵軍的主力交綏；應該向敵人最弱的環子或最致命的地方集中攻擊。

「九、必須要用一切的警戒，使敵人不能發現游擊隊的主力所在。因此，當敵人行進時，游擊隊切不要集中在一個地方，而應該時常變換位置——當向敵人進攻的前刻，在一天成一夜裏，必須要變換兩次或三次。游擊隊的祕密移動，是勝利所絕對必須的條件。按照一定計劃很好的分散與集中，是實行遭遇戰時所必需的。

「十、除了高度的機動性以外，因為游擊隊和地方羣衆不能分開，所以情報非靈通，而對此也應該予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在理想上，每一個農民都應當是游擊隊諜探部的一個工作人員，能夠這樣，則敵軍的每一個動作就沒有游擊隊不知道的了。游擊隊應該用最大的注意去保證關於敵軍的情報，同時，還應該經常立幾個輔助的情報網。」

以上這十個原則，根據彭總指揮所說，是紅軍所以形成現在這樣勢力的戰術指針。彭將軍接着說：

「所以你看，要想游擊戰爭勝利，竟要求這樣多的基本條件：勇敢、敏捷、動機、祕密、諜報計劃，

以及行動時的奇突堅決。這些條件如果缺一，則游擊隊即難獲得勝利。爲什麼因爲在戰鬥開始時，假如他們缺少迅速和決斷，則戰鬥勢必延長。他們必須敏捷，否則敵軍就要增援。他們必須根據可靠的情報去秘密佈置作戰計劃，而行動時又必須奇突，否則敵軍就要跑掉，或者增援備戰。他們必須機動而有彈性，不然他們就要失掉了彼等對於游擊戰的利益。

「最後，游擊隊所絕對必要的，就是爭取農民羣衆援助自己並參加自己的隊伍。假如不能動員並武裝起來農民大衆，則事實上游擊隊即沒有基礎，因而也不能存在。只有把革命的種子深入人心，只有執行羣衆的要求，只有把羣衆團結在蘇維埃的周圍，並且只有藉着羣衆的蔭蔽，游擊戰爭才能獲得革命的勝利。」

這時我坐在桌子旁邊筆記，彭將軍則到屋子外邊走廊上走來走去，不時回到屋子裏來告訴我幾句。突然，他停住脚步，站在那裏若有所思。

「但是，沒有一件事情，絕對沒有一件事情，比這個還重要，——那就是紅軍是民衆的軍隊，其所以以發榮滋長，是因爲得到民衆的援助。

「我記得是在一九二八年冬天吧，當我領的隊伍在湖南損傷的只剩兩千多人了，同時我

們又陷入重圍。當時國民黨軍隊把我們周圍三百里的房屋完全燒掉，把一切食物都括掠淨盡，隨即封鎖我們。我們沒有衣服穿，我們用樹皮當作短衣，我們把褲腿割上來製造鞋子。我們的頭髮都長得很長，我們沒有住所，沒有油燈，沒有鹹鹽。我們大家都病了，而且陷於半飢饉狀態。農民比我們也好不多少，同時凡是他們的東西我們一點也不動彈。

「但是農民們却鼓舞我們。他們把白軍來時藏在地下的米穀掘出來給我們吃，而他們自己則吃土豆、草根，他們憎恨白軍，因為燒他們的房子，偷他的米。其實我們到這裏來以前，他們就已經把地主和稅吏打跑，因此他們歡迎我們。有許多人加入我們的隊伍，而且幾乎全體來分頭幫助我們。他們願意讓我們戰勝！因此，我們繼續打下去，終於突破了封鎖！」

彭轉向我非常簡要明切的結束道：「戰術固然重要，但是假如沒有廣大的民衆來援助我們，我們終究不能存在。我們不是別的，正是民衆解放的先鋒隊啊！」

不管彭氏說的對不對，但是我不能忽視他語中的信仰力。

一個美國人的塞上行

(全一冊)

每冊二角五分

原著者 美 史 諾

譯者 侯 名

發行者 新 生 出 版 社

經售處 北 新 書 局

廣州永漢北路

大 公 書 局

香港皇后大道

中華民國廿七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17
10044

10044